

# 水運社會的地方文化網絡

## ——以宋以來廣州府番禺縣沙灣司磚瓦業和龍船習俗為中心的考察

朱光文

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 提要

南山峽地處廣州府番禺縣西南端沙灣司市橋水道上游，是連接珠江口和珠三角腹地，乃至西江中上游地區的水路交通要道。本文梳理宋元以來該地區水運社會及其社會文化網絡的織造過程。明清官府設立巡檢司、營汛、掛號口等對該地區進行管治。明代以來，依託便利的水運，催生了發達的磚瓦業，並發展成為珠三角地區傳統建材中心之一，也為業緣火神崇拜的出現創造契機。由於地勢險要、盜寇橫行，船難多發，奠定南山古廟河神崇拜的基礎。清中葉以來，宗族角力、地方動亂、村社分合、民國「大天二」等因素都促使水道兩岸分屬不同社、大部份從事磚瓦業的村落在競爭中形成兩大聯盟和龍船會。他們在端午節前夕到南山古廟進行「採青」、「請龍」儀式，以此表達村落之間的水上關係網。由此，多個屬於不同體系的社會網絡，不同時期，在相互疊加、交互作用中織造光怪陸離的水運社會地方文化網絡。1949年以來，磚瓦業轉型消失。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兩岸龍船習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與再造。龍船會成為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接納了新的成員，原有的地方歷史文化脈絡得以延續和重構。作為「非遺」的「南山古廟龍舟習俗」也成為當地政府在市橋水道舉辦龍舟賽的某種歷史依託。南

---

朱光文，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廣東廣州，郵政編碼：511400，電郵：772625091@qq.com。

山峽地區是華南水運社會文化網絡的多次「結構過程」及其在當代以龍舟習俗的形式得以再現的典型個案。

**關鍵詞：**番禺縣沙灣司、南山峽、磚瓦業、龍舟、水運社會、文化網絡

番禺學者鄔慶時在〈廣東沙田之一面〉一文中，用了較長的篇幅描述了清末民初番禺縣南部各地各聯盟的社會文化網絡：

至於村與村之間，舊農村往往聯合同地區各村而為一社。如十八鄉之為岡尾社，十七鄉之為深水社，九鄉之為東山社。又或族與族各聯為同宗，如沙灣之何與大石之何，石樓之陳與坑頭之陳，均有極為親切之聯絡。甚或劉、關、張三族以劉備、關羽、張飛故事，或更加入趙雲，而為劉關張趙，亦團結一致，視同兄弟，相友，相助，相扶持。此外更有因遠祖有婚姻關係，兩鄉兩族之人均以老表相呼相待而特別親密者。各鄉各族或有一人得科第或入仕途則同鄉或同族必請其人到祠謁祖，以加強聯絡。若有一鄉或一族被別鄉或別族欺凌以致械鬥，則同鄉或同族以至凡有聯繫之各鄉或各族均視若自己之事，各率丁壯，自攜槍械，前往助戰，雖死無悔。即婦女亦挺身往任運輸、救護、炊事等職務，習以為常。或個人被別鄉或別族欺凌，亦時有出而禦侮者。又或娛樂之舉如鬥龍船，遊戲之事如擲石子，皆各樹一幟，各走一端，協力同心，如臨大敵，雖親戚朋友，不相避，亦不相讓。<sup>①</sup>

在鄔氏的筆下，這些民田區的村落依託「社」建立陸上聯盟，並圍繞「社廟（神）」舉辦迎神賽會活動，以及以「社」為單位組建團練組織（鄉約式社學或書院）。此外還有體現同姓族際聯盟的聯宗祭祖、功名互相借勢等，以及異姓歃血為盟，又或以婚姻、老表等形式結為盟友等。而陸上的聯盟關係又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龍舟習俗等水上交際圈的儀式性表達。以下筆者嘗試以沙灣司南山峽及市橋水道中上游沿線地區為例，系統梳理宋元以來南山峽地區水運社會的演變過程，以及水運系統、村社組織、磚瓦行業組織、龍船會等地方社會文化網絡。

<sup>①</sup> 鄔慶時，〈廣東沙田之一面〉，載廣東省政協文化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精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上編，第3卷，頁27-28。

## 一、宋元以來南山峽地區的磚瓦業、陶瓷業與水運社會的形成

### (一) 平石、沙墟兩地水運的式微與明代南山峽磚瓦業的興起

南山峽位於番禺大穀圍西南，大穀圍與沙灣地區之間。南岸的青蘿嶂與北岸的大烏岡（大夫山）的餘脈紅蘿嶂夾江對峙，形成峽口，歷來是航行險道。<sup>②</sup> 乾隆《番禺縣志》載：「南山峽，在抱旗峰之南三里，石壁相峙，珠江貫其中。」<sup>③</sup> 南山峽為市橋水道與陳村水道交匯之處，是大籬圍南水（即沙灣水道和市橋水道）連接大穀圍西水（即陳村水道）的便捷通道，是番禺南部和珠江口船隻經過市橋水道和陳村水道前往廣州、佛山乃至珠三角腹地的一條捷徑。

便捷的水運催生了磚瓦業、陶瓷業。南山峽及鄰近地區有文字記載的水運及磚瓦業、陶瓷業生產歷史可追溯到宋代。北宋曾於廣州周邊設八大鎮：「望南海六鄉大通一鎮，上番禺五鄉瑞石、並石、獵德、大水、石門、白田、扶胥七鎮。」<sup>④</sup> 這些市鎮絕大部份設立於水運要衝。其中，並石鎮，曾昭璿稱為「平石鎮」，南山峽西北，有水道與之相通，其舊址約位於今謝村東南的勝石坊附近。<sup>⑤</sup> 在南山峽東南方向、同樣位於市橋水道北岸的沙墟也曾是明代以前禺南地區繁盛一時的市鎮。考古部門曾於此發現古窯址，經鑒定為北宋遺物，證明宋時已有人居住，並以製作磚瓦為業，為供應燒窯工人的生活需要和農副產品與手工業品的交換，形成集市。<sup>⑥</sup>

宋代的平石、沙墟兩地均瀕臨水道，水運便利，符合磚瓦業、陶瓷業的存在條件。《元一統志》仍有「平石鎮」一名，但是元代該水道淤淺已不重要。<sup>⑦</sup> 宋元時期，隨着老三角洲的形成，江河入海口向前伸出到市橋臺地，經沙灣青蘿嶂、順德大良、中山小欖至新會一線。西江和北江的河水，經由這些臺地山丘之間沖出，注入這一線以外的海灣中。由這些江河水夾帶而來

②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256。

③ 乾隆《番禺縣志》（《故宮珍本叢刊》本），卷4，〈山水志·山·南山峽〉，頁41。

④ 王存，《元豐九域志》（《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版），卷19，〈廣南路·東路〉，頁17。

⑤ 曾昭璿，〈宋代廣州衛星城鎮考〉，《廣東史志》，1998年，第4期，頁11。

⑥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番禺縣鎮村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55。

⑦ 曾昭璿，〈宋代廣州衛星城鎮考〉，頁11。

的泥沙和來自上游的腐植質開始在這些山丘臺地的邊緣積聚起來，形成新的淺灘、沙坦。沙灣何氏宗族在番禺南部佔有大片沙田，不是在宋代而應該是在明清之際之後。<sup>⑧</sup>明代番禺南部成陸的範圍，大致上仍在明代〈廣州普渡庵記〉中所說「外接大洋」的紫坭、沙灣、市橋至石碁一線。<sup>⑨</sup>明代南山峽和市橋水道上游地區還是一個以青蘿嶂、沙頭、白沙堡、沙墟等幾個點連接而成的不規則海灣，一些新的淺灘、沙坦開始在河岸邊緣形成。<sup>⑩</sup>明代以來，隨着市橋水道南北兩岸大片沙田和灘塗的形成，水道淤淺，沙墟的水運交通亦日漸式微，逐步為一旁水運便利的市橋所取代。<sup>⑪</sup>雖然民國《番禺縣續志》仍有沙墟墟市的記載：「沙墟，在沙墟鄉，茶園堡六圖七甲公建，墟東總匯處有門樓，同治間建，宣統初修。」<sup>⑫</sup>但沙墟的市場中心地位已為市橋的鳳鳴、三塘（堂）、市底等墟市所取代。<sup>⑬</sup>正是由於平石、沙墟兩地水運的衰落，地處兩者之間的南山峽兩岸和市橋成為清代禺南地區著名的磚瓦業和造船業中心。

元代，位於市橋水道上游、地勢險要的南山峽一帶就成為佛寺的棲息之地：「南山覺海尼寺，在郡南欖山堡南山峽口，耆舊相傳元至元二年鄉眾創建，元末毀。國朝洪武十四年尼沙高重建，復毀於寇。尼遂淪沒。有田二頃五十六畝一分。」<sup>⑭</sup>可見，元明之際，控制這一帶的是一座名為「南海覺海尼寺」的佛寺，明初以來屢毀屢建，最後歸於湮沒。

明代，番禺縣屬廣州府管轄，五個巡檢司由縣令吳廷對在洪武三年（1370）改設。改設的巡檢司前身大都為明代之前土豪控制的軍事城寨。<sup>⑮</sup>從永樂《廣州府志》的「廣州府番禺縣之圖」可見明初禺南地區已有沙灣司和菱塘司的建置。其中，沙灣巡檢司署設於市橋以北的白沙堡。明中後期，

⑧ 劉志偉，〈宗族與沙田開發：番禺沙灣何族的個案研究〉，《中國農史》，1992年，第4期，頁34-41。

⑨ 劉志偉，〈地域空間中的國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14-24。

⑩ 佛山地區革命委員會《珠江三角洲農業志》編寫組，《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初稿）·一·珠江三角洲形成發育和開發史》（1976），〈新石器時代珠江三角洲成沙範圍示意圖〉，頁112-113。

⑪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番禺縣鎮村志》，頁55-56。

⑫ 民國《番禺縣續志》（《中國方志叢書》本），卷6，〈建置志四·墟市〉，頁109。

⑬ 同治《番禺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本），卷18，〈建置略五·墟市〉，頁212；及民國《番禺縣續志》，卷6，〈建置志四·墟市〉，頁109。

⑭ 成化《廣州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卷25，〈番禺縣·寺〉，頁1066。

⑮ 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10，〈公署〉，頁194-195。

隨着水運日盛，官府為了加強管理，將原來位於白沙堡的沙灣巡檢司南遷到臨近江邊的市橋，這與當時水運中心由沙墟轉移到市橋及南山峽一帶的趨勢相一致。

明代到清初，隨着南山峽及其周邊地區水運地位的凸顯，磚瓦業開始出現，並向南北兩岸村落擴散。在南山峽上游不遠處的屏山（原宋代平石鎮附近）就發現了明代的磚瓦窯遺址。<sup>①⑥</sup> 南山峽口內的南山埠是磚瓦業的最早生產發源地，<sup>①⑦</sup> 「沙灣埠」的磚瓦窯最初在南山峽興建，後逐步擴展到東起渡頭、西達南山峽，長二公里多的市橋水道的南北兩岸。<sup>①⑧</sup> 至於「四埠」建窯的時間，說法有二：一是根據南莊河畔關帝廟（內設蘭陵熱瓦行會館）內的碑文記載定為明代；二是根據番禺建材廠宣傳資料檔案記載為公元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sup>①⑨</sup> 據鄉中父老曾秉說，20世紀70年代村裡挖防空洞時，挖出一塊刻有「天啟元年」的瓦，說明此時南山峽南岸螺陽社一帶已經有磚瓦業存在。<sup>②⑩</sup> 明代繁忙的南山峽一帶的水運景觀已進入當地文人的視野，成為沙灣鄉村八景之一和被吟詠的對象。明永曆間（1647-1661）何如澄所撰的〈沙灣原址考〉提到沙灣青蘿八景，其中的「新村古渡」和「峽口斜陽」<sup>②⑪</sup> 就是南山峽一帶的景觀。

綜上所述，南山峽一帶的磚瓦業始於明代中後期，不遲於清初，而南山埠則是這一帶磚瓦業的最早發源地，後來才逐漸向峽口下游南北兩岸擴散。（參見附圖1）

①⑥ 1998年考古部門曾在古平石鎮附近的屏山二村清理出較為完整的明代古窯址一座，說明在明代這裡仍有磚瓦、陶瓷業生產。參見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博物館，〈番禺屏山明代遺址發掘簡報〉，《廣州文博》，2001年，第2期；陳建華主編，《廣州市文物普查彙編·番禺區卷》（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頁39。

①⑦ 褚鏡，〈解放前後番禺沙灣埠磚瓦生產情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番禺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番禺文史資料》（1984），第2期，頁106。

①⑧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200。

①⑨ 龍卓傑，〈明清·渡頭「四埠」磚瓦窯址〉，載司徒彤主編，《番禺縣文物志》（1988），頁48。

②⑩ 曾家豪、曾秉，《龍岐村簡志》（2000），頁3。

②⑪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43，〈餘事志一〉，頁609。

## （二）清初到清中葉：南山峽地區的水運與磚瓦業的復興

### 1、遷海與復界後南山峽地區水運的復興

明清之際，社會動盪不安。在沙灣《何氏族譜》中，特別提到了由明到清的朝代更迭中，奴僕聯合沙灣以外七村分別結營設寨起事的經過：

永曆丙戌冬，南嶺初腥，鄉難隨作，各姓奴僕，盡悖主以煽亂，而七村惡少，俱從而和之，設營結寨，行劫掠，恣無忌憚，以貫二社為名，致我五姓雞犬不寧，各家越境，以避其鋒。<sup>②</sup>

當時沙灣鄉內何、王、李各姓子孫，皆逃亡他鄉。何姓族人避地市橋，王姓族人避地陳村，其他三族亦避難他處。沙灣各大宗族產業被毀，宗族成員被殺，何族的留耕堂大門被燒毀淨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七村」就是後來的螺陽社七鄉。明末清初「七村」隨沙灣宗族奴僕起事，表明了他們與沙灣鄉各大宗族之間曾經有着不可調和的關係。

康熙三年（1664）遷海期間，原設置於市橋的沙灣巡檢司被迫遷到鍾村，據縣志載：「康熙三年拆邊，市橋奉遷，業經拆毀，後於鍾村民房居住，令仍移市橋。」<sup>③</sup>康熙《番禺縣志》中的〈番禺縣境圖〉已在鍾村的位置標注了沙灣巡檢司，且載：「慈濟宮，在市橋鄉，前臨滄海，後接飛鳳山，汪洋巨浸，極目千里，蛋舟晚薄，漁歌之聲相接。徙海時，諸寺觀皆毀，而此廟以靈感巍然獨存云。」<sup>④</sup>市橋遷海的情況如此，緊鄰市橋的南山峽地區兩岸的村落此時當亦遭到極大的破壞。遷海復界後沙灣巡檢司「令仍移市橋」。<sup>⑤</sup>同時，大量非遷海地區的居民來到南山峽一帶開墾土地，社會逐步恢復。雍正年間，隨着水運的恢復和繁榮，作為祭祀水上保護神——天后的廟宇也在南山峽口應運而生。現存雍正四年（1726）由當時員崗舉人崔魁文撰文、鍾村舉人李顯祖書碑的《南山峽口古廟碑記》，用一半的篇幅講述了南山鄉東北方向的員崗崔族入贅南山鄉，並在南山峽口一帶定居，納入清代圖甲，建祠立宅、創建天后廟的過程：

② 沙灣《何氏族譜》（抄本），〈留耕堂考〉。

③ 乾隆《番禺縣志》，卷6，〈建置·解署〉，頁74。

④ 康熙《番禺縣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本），卷4，〈建置·觀〉，頁401。

⑤ 乾隆《番禺縣志》，卷6，〈建置·解署〉，頁74。

峽口天后宮，南山鄉香火也。余族祖□隱公娶西□百城黃公女，至則觀其鄉，負山臨水以耕、以釣，足為隱者所盤桓。遂自員山偕安人來定居，址即其自號，意念深矣。生子女，女妻鐘山南隱公李公。久之，壻猶翁志，從而徙居，亦以南山為可隱也。建祠立宅，隨同創廟在峽前，地廣一畝，稅載員岡三圖五甲崔大勉戶。廟貌嗣世修理，祈藉麻蔭廣子孫。俾相時出處，如昔人所云「開門而出仕，閉門而歸隱」，於斯以卜之也。<sup>②⑥</sup>

這裡呈現了清初遷海復界後，禺南地區的人口從非遷海區（員崗）向遷海區遷徙流動（入贅），從而實現社會逐步恢復的過程。而碑文的後半部份描述了南山峽在周邊地區乃至珠江流域水運網絡中的重要地位：

今南山，濱海峽，為水所歸注。溯厥水，源自緬甸、犍牂，經黔滇、西粵，東流肇陽，合韶江，繞西樵、甘竹。而後，環抱大夫山之陰，特成一峽，以束其流，復加青蘿為之障，實稱萬壑之奔赴，而廟據其上，故極澎湃之奇。搃□峽內，全不見其所往。蓋水以行之，山以畜之，非獨形勝異也。於一生六，成之義深，有脗合其祀天后神□宜，地傑則神靈，而人受福麻蔭，寧有涯哉？斯□廟也，疊障層巒擁其後，波瀾洶湧壯其前，雞犬桑麻，潮以彌望，人之所樂，神之所護也。<sup>②⑦</sup>

該碑顯示，雍正四年（1726）南山峽口天后宮已成為黃、崔、李三姓共有的「鄉廟」，這座天后宮的出現是遷海復界後，非遷海的區域帶動遷海區域經濟社會恢復，進而帶動水運發展的結果。<sup>②⑧</sup>

## 2、乾隆年間，官府對水運管治的加強與磚瓦業的復興

乾隆年間，隨着廣州一口通商貿易的發展和珠江水運的繁榮，南山峽地區在水運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據乾隆五年（1740）《（沙涌）重修兩廟

<sup>②⑥</sup> 《南山峽口古廟碑記》（雍正四年〔1726〕），碑存番禺區市橋街沙墟二村。

<sup>②⑦</sup> 《南山峽口古廟碑記》。

<sup>②⑧</sup> 朱光文，〈水運網絡、地方教化與天后崇拜——以明中葉至清中葉廣州府番禺縣沙灣巡檢司地區為例〉，《地方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頁89-100。



碑記》載：「吾鄉接青蘿山色，控虎門煙波，地傑也，靈爽式憑焉。自前朝創建，天后娘、關夫子兩廟，一在鄉之東，一在鄉之中，由來久矣……」<sup>29</sup>這裡的「青蘿山色」說的正是南山峽一帶，說明南山峽是像沙涌這樣的沙灣市橋水道臨水村落水運的重要節點。

清乾嘉年間，隨着地方吏治的腐敗和廣東沿海海防、盜寇問題日益嚴重化，朝廷和廣東地方官府在平定老鼠山盜亂後，作為善後措施之一，奏請朝廷設立新的機構以應對、彈壓日益嚴重的官盜勾結問題。<sup>30</sup>除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於坑頭設立永寧通判署外，同年三月，兵部同意廣東官府設防要求設立永靖營，並派官兵在南山峽一帶駐防：「番禺縣屬沙灣、菱塘之石碁地方，設立專營<sup>31</sup>，以資防守，應設遊擊、守備各一員，中哨千總一員，外委千總二員，左哨、右哨、把總各一員，外委把總各二員，馬步戰守兵六百三十名，哨船六隻，均於各標內酌撥移駐，仍隸提督管理。」<sup>32</sup>乾隆《番禺縣志》，卷10，〈兵防·防汛〉：「至哨埠之為……沙灣哨、南山峽口埠、市底埠凡二十有一，前志載各有兵壯哨船或間設哨官者也。」<sup>33</sup>

乾隆年間，官府除了設立營汛和沙灣埠派駐官兵駐防，直接介入南山峽地區的管理，徵收賦稅，管理地方治安外，還在鄰近的市橋設立掛號口和紫泥掛號口，將其納入粵海關港口管理體系。《粵海關志》中附有〈市橋口圖〉，其中就繪有「南山汛」，與「龍灣汛」一起據守市橋、沙灣水道上有通往省城廣州的要道，成為粵海關下轄的市橋口的重要門戶之一。<sup>34</sup>從鄰近南山峽的市橋、紫泥兩大掛號口的徵稅稅則可以見到磚瓦業在當地的水運中佔據相當的份額。《粵海關志》，卷11，〈稅則四·市橋掛號口〉就專門提到：「磚瓦船，大船收銀八分，小船收銀四分。」<sup>35</sup>〈稅則四·紫坭掛號口〉亦載：「扁船裝載房料、石灰、磚瓦出口往澳，每隻收銀二錢五分。」<sup>36</sup>乾嘉年間，

<sup>29</sup> 《（沙涌）重修兩廟碑記》（乾隆五年〔1740〕），碑存番禺區大龍街沙涌村天后宮。

<sup>30</sup> 朱光文、陳銘新，《名鄉坑頭：歷史、社會與文化》（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3），頁57-59。

<sup>31</sup> 即後來的永靖營都司。

<sup>32</sup>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清實錄》本），卷1153，頁448。

<sup>33</sup> 乾隆《番禺縣志》，卷10，〈兵防·防汛〉，頁135。

<sup>34</sup> 梁廷枏撰，袁鍾仁點校，《粵海關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卷5，〈口岸一〉，頁74。

<sup>35</sup> 梁廷枏撰，袁鍾仁點校，《粵海關志》，卷11，〈稅則四·市橋掛號口〉，頁225。

<sup>36</sup> 梁廷枏撰，袁鍾仁點校，《粵海關志》，卷11，〈稅則四·紫坭掛號口〉，頁229。

依託水運的便利，南山峽地區形成南岸的渡頭<sup>37</sup>、蘭陵、杉巖和北岸的南山、南莊、北海等埠。嘉慶年間，渡頭有三個小埗頭、一個大埗頭，成為重要的磚瓦業生產基地、集散市場和水運中心。清道光年間又在渡頭建了大碼頭，為坤甸木結構，設有旅客候船的竹木大棚。<sup>38</sup>

### 3、清道光以來：南山峽地區的水運與磚瓦業的鼎盛

嘉慶年間，張保海盜集團劫掠中路的番禺沙灣司和順德地區的海盜頭目為郭婆帶，主要波及沙灣市橋水道及陳村水道沿岸的市橋、沙灣、紫坭、三善、古壩、龍灣、屏山等村落。嘉慶十四年（1809），海盜先後在市橋和沙灣遭到有力的抵抗。<sup>39</sup>此後，廣東官府「應紳民之請」在備受海盜侵擾的沙灣司三善等九鄉建立鄉防炮臺。<sup>40</sup>至於海盜入侵對南山峽兩岸的影響，筆者暫未見到相關的文獻。清代後期，作為駐防綠營基層組織的營汛系統，其下標營、協營、城守營、分防營、汛塘分工明確，各有防守重點，成為穩控正常社會秩序的地方主要力量。<sup>41</sup>營汛除了覆蓋廣東省城之外，也佈置在番禺縣各巡檢司鄉間的關津險要與交通要道。「洪兵之亂」後，社會相對安寧，延至光緒五年（1879），廣東官府繼續在南山峽設立機構駐兵管理，《廣州府志》載：「永靖營都司署，在廣州府東南九十里，番禺縣屬石碁汛。乾隆四十七年撥提標左營遊擊設立永靖營，今改設都司。」<sup>42</sup>同治《番禺縣志》載永靖營下設有「右哨二司額外外委駐南山汛」<sup>43</sup>。〈經政略·兵防〉亦載：「南山汛，額外外委一員，兵十二名，上至蜆步汛十五里，下至深涌汛十里，大夫岡河面巡船一隻。」<sup>44</sup>而〈經政略·弓兵·附舊制〉載有「哨埠二十一」，其中就有新設的「南山峽埠」和「沙灣埠」。<sup>45</sup>光緒十五年（1888）

<sup>37</sup> 原名為「龍津」，亦稱「南津」，相應北岸的北海稱「北津」。

<sup>38</sup> 陳藻，〈話說沙灣螺陽鄉〉，《番禺古今》，第5期（2001年10月），頁96-97。

<sup>39</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45，列傳14，〈謝大韜〉，頁565。關於嘉靖年間海盜入侵珠三角的情況，詳見袁永綸，《靖海氛記》（道光十年〔1830〕刊、丁酉年〔1837〕續刊）上卷，轉見蕭國健、卜永堅箋注，〈（清）袁永綸《靖海氛記》箋註專號〉，《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中心資料通訊》，第46期（2007年1月），頁1-49。

<sup>40</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4，〈建置略一〉，頁150。

<sup>41</sup> 相關研究參見劉洋，《清代基層權力與社會管理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未刊博士論文，2012）。

<sup>42</sup> 光緒《廣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本），卷65，〈建置略二·廨署〉，頁105。

<sup>43</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9，〈經政略·永靖營制〉，頁231。

<sup>44</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9，〈經政略·兵防〉，頁228。

<sup>45</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9，〈經政略·弓兵·附舊制〉，頁232。

坑頭《重修武帝古廟碑記》仍見有以「沙灣埠」或「沙灣鹽埠」名義捐資的情況。可見，起碼從清乾隆年間開始，一直延續到光緒年間，南山峽地區都是極具航運、軍事和商業意義的地方，成為地方官府派駐營汛重兵駐守的地方。到民國後期，南山峽地區依然是禺南地區重要的水運樞紐：「碧水漪漪灣復灣，南山峽下照清潭。當年水患天然閘，屏障禺南第一關。」<sup>④⑥</sup>

清末民初，南山峽地區磚瓦業發展達到鼎盛，其分佈有「四埠」、「五埠」甚至「六埠」之說。龍卓傑據設於南莊河畔的關帝廟碑文記載認為，南山峽南岸的渡頭一帶曾出現南山埠、南莊埠、杉巖埠、蘭陵埠，總稱「四埠」，<sup>④⑦</sup>沒有提到渡頭埠（或者渡頭上下埠）和南山埠。而民國《番禺縣續志》只提到了五個地方：

……能維持現狀者，首推磚瓦業。沙灣司之渡頭、杉巖、南莊、南山、北海，芟塘司之白蜆殼……均以燒磚瓦為業，磚窯、瓦窯共百餘座。<sup>④⑧</sup>

其中沒有提及蘭陵埠。清末民初，在當時百業蕭條的情況下，南山峽地區的磚瓦業依然繁榮，「以出品精良，廣州建築多半用之，生意尚佳」<sup>④⑨</sup>，成為珠三角重要的磚瓦建材中心。褚鏡將渡頭分為上下埠，變成「六埠」。<sup>⑤⑩</sup>李家達認為「北海一河兩岸，南邊有渡頭埠、蘭陵埠、杉巖埠，北邊有北海埠、南莊埠、南山埠等共六處，總稱沙灣埠」。<sup>⑤⑪</sup>可見，所謂「沙灣埠」其實是四到六處磚瓦生產基地的總稱。至於這些埠所對應的具體村落的範圍就更加大了，包括北岸的南山、玉棠、雙坑<sup>⑤⑫</sup>、蓮湖、橫江、汀根、北海，南岸的渡頭、蘭陵、杉巖、田心等11座村莊居民的祖輩都是從事磚瓦生產的。<sup>⑤⑬</sup>據《沙灣鎮志》載，建國前全盛時（二三十年代）有窯爐90個以上，

④⑥ 柳翁，〈柳翁詩鈔·南山峽〉，《新番禺月刊》，第2期（民國三十八年〔1949〕1月），頁20。李偉東先生提供。

④⑦ 龍卓傑，〈明清·渡頭「四埠」磚瓦窯址〉，頁48。

④⑧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12，〈實業志·工商業〉，頁188。

④⑨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12，〈實業志·工商業〉，頁188。

⑤⑩ 褚鏡，〈解放前後禺南沙灣埠磚瓦生產情況〉，頁106。

⑤⑪ 李家達，〈五十年來渡頭磚瓦業的情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番禺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番禺文史資料》（1984），第2期，頁103。

⑤⑫ 這三村後來合併為「南雙玉」行政村。

⑤⑬ 龍卓傑，〈明清·渡頭「四埠」磚瓦窯址〉，頁48。

從事磚瓦業生產的達2,000多人，為磚瓦窯運輸的木帆船每日達100多艘。民國時期，沙灣埠生產的三角牌紅磚，曾遠銷香港，直到婆羅洲。<sup>54</sup> 民國三十八年（1949）元旦出版的《新番禺月刊》用了南山峽地區的磚瓦窯作為封面照片，可見這一時期磚瓦業已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標誌之一。（參見附圖2）

## 二、清末民國時期南山峽地區的磚瓦行業組織與行業神崇拜

### （一）兩岸磚瓦業的行業組織

關於南山峽兩岸的磚瓦業的行業組織，民國《番禺縣續志》載：「有會館二：在蘭陵者，曰熟瓦行；在渡頭者，曰生瓦行。」<sup>55</sup> 「生瓦行代表工方司事，熟瓦行代表窯號，凡雙方有異議提出時，就由雙方按其本方意見進行協商，簽訂協議進行生產，做到一律有例不減，無例不加。」<sup>56</sup> 這兩大行的會館均設在南岸地區，其中蘭陵埠熟瓦行會館位於南莊河畔的關帝廟內，渡頭埠的生瓦行會館設在供奉大禹的師傅廟內。<sup>57</sup> 清末以來，整個南山峽地區磚瓦業的行業組織大致由代表工方司事的「生瓦行」和代表窯號的「熟瓦行」構成。建窯的資金由各村太公的祖嘗付出。建窯地點是根據各村的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定，按地方大小而規劃窯的大小。建成之後再用投標方式租給出價高者當窯主，一般年限為10年一期。租金以稻穀為本位，視窯的大小及位置，年租金各窯從二、三千斤稻穀至五、六千斤稻穀不等。窯主有獨資經營及合資經營兩類。磚瓦窯的工種主要有生胚工、裝工、燒火工、睇火師、散工（包括入窯、出窯、起卸、落船等）、長工（兼採購、伙食等）。其中睇火師多是窯戶經營者兼任。一般每窯有師傅（裝窯工）兩到四名、助手多名。<sup>58</sup> 勞動力的來源除做生胚工種用外地人，其餘的工種如出入窖、燒火、挑擔等，均多用本村人。<sup>59</sup> 可見，南山峽地區的磚瓦窯大都由各鄉的宗族組

<sup>54</sup>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200。

<sup>55</sup>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12，〈實業志·工商業〉，頁188。

<sup>56</sup> 褚鏡，〈解放前後禺南沙灣埠磚瓦生產情況〉，頁106-107。

<sup>57</sup> 龍卓傑，〈明清·渡頭「四埠」磚瓦窯址〉，頁48。

<sup>58</sup>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200。

<sup>59</sup> 李家達，〈五十年來渡頭磚瓦業的情況〉，頁103-106。

織出資興建，並出租給窯主經營賺取租金。各鄉宗族的族人也廣泛參與其中。南岸螺陽社的七鄉與南山峽南岸從事磚瓦業的渡頭上下埠、蘭陵埠、杉巖埠及其所覆蓋的村落範圍基本重合。螺陽社七鄉中便有不少磚瓦業從業者，絕大多數是勞動者（即工方生瓦行），極少數是經營者（即出資方）。因此，螺陽社可視為南岸磚瓦業村落群體的陸上聯盟組織。由於南岸的資方壟斷了資金的來源，北岸如橫江、南山、玉棠、雙坑等磚瓦窯大都由南岸的宗族投資建設，然後雇請當地人來進行生產。<sup>⑩</sup>

## （二）南岸螺陽社村落的磚瓦行業神崇拜

學術界關於行業神崇拜的研究認為，行業神由最初的從業者在家中單獨奉神，逐步轉化為由行會組織在行業會館所內共同祭祀，後與民間迎神賽會等結合，規模逐漸擴大。近代以來，傳統行會向新式同業公會轉變，行業神崇拜更加側重商業性質。隨着科學考試的取消和戰亂的頻繁，行業神信仰受到一定的衝擊，但在多種工商行業中行業神信仰的傳統功能仍有承襲。<sup>⑪</sup> 南山峽南岸地區的磚瓦業行業神可以分為祖師神和行業保護神兩種，如上文提到工方生瓦行工匠奉祀的渡頭大禹就屬於祖師神，而南岸位於南莊河畔的關帝和螺陽社七鄉幾個村落從事磚瓦業的主要村落都祭祀的侯王就屬於行業保護神。前者是資方熟瓦行的保護神，後者則兼有村社保護神和整個磚瓦業保護神的角色。據《沙灣鎮志》載，龍岐村〔含龍津（渡頭）和岐頭兩村〕有「侯王古廟」和「侯王廟」，即除了渡頭有侯王大廟之外，還有岐頭「細廟」<sup>⑫</sup>，保存至今，光緒十八年（1892）重修。民國《番禺縣續志》載：「水月宮、侯王廟，以上二廟均在螺陽社新村，香火頗盛。」<sup>⑬</sup> 這說明清末新村也曾建有侯王廟，被稱為「細廟」。<sup>⑭</sup>（參見附表1）

渡頭作為螺陽社社址所在，是南岸七鄉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裡曾建有侯王宮，與螺陽社學配合，是七鄉祭祀侯王的主神廟和祭祀中心。侯

⑩ 訪談筆記：陳藻，2018年8月25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⑪ 董虹，〈近代以來行業神信仰的變遷——以華北地區為例〉，《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頁36-39。

⑫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525。

⑬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5，〈建置志三·壇廟〉，頁103。

⑭ 該廟位於莫氏宗祠北側，在土改時期拆毀。據《沙灣鎮志》載，今福田行政村範圍內除了新村之外，還有另外一座侯王廟，也有大細之分，但未明所在。見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525。

王既保佑磚瓦業興旺，又是防江洋大盜的護村之神。侯王宮位於螺崗崗腳，坐南朝北，面向市橋水道，青磚碌瓦硬山頂型建築，神龕上掛「保南堂」牌匾。該廟建築規模最大，故村民慣稱「大廟」。廟門楹聯：「功迴宋室；惠蔭黎元。」廟門前有一片沙地廣場。廟中供奉的神像是宋仁宗時代以狄青為首的五虎將之一——李義。五虎將中，除了狄青是皇室親戚之外，李義、石玉、張忠、劉慶四人都是燒磚瓦出身，從軍後和狄青一起當夥頭軍，日後屢立戰功。「五虎平西平南」故事流傳甚廣，皇帝賜封為侯，李義鎮守南疆，號「保南王」。<sup>65</sup>而陳藻認為，渡頭瓦窯大多數業主姓李，是李昂英探花的後裔，遠祖是隴西郡人，故定李義為崇拜神像。平時許多瓦窯工頂禮參拜，每到農曆八月二十日神誕，香火甚旺。陳藻對清末民國時期的螺陽七鄉侯王誕祭祀活動做了細緻的描述：

每年農曆八月二十二日的侯王誕，吸引了周邊各村群眾爭相觀看別具藝術特色的「搶花炮」活動。大炮並不是火炮，而是特製巨型爆竹。該活動由螺陽社鄉政府組織，上述「七鄉」村民組成花炮會，會員平時習武練功，腰纏紗帶，大多數是在瓦窯挑磚瓦、挑泥的工人，因在水岸邊工作。他們俗稱「海邊龍」，飯量很大，氣力了得，代表所在村參賽。侯王誕那天，鄉政府預先在廟前沙地築起高臺（模樣似擂臺），掛滿彩旗<sup>66</sup>，評判員是各村選出的鄉紳，有一桌擺放一隻燒豬和三醒白酒，大小鏡屏三隻，鏡屏刻有「一帆風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字樣。早上九時，「搶花炮」正式開始。參賽者先進香拜李義神。高臺左右有儀仗隊，敲鑼打鼓、吹嗩吶（D打）。主臺擺放數枚巨型花炮，只有三枚藏有紅、藍、黃的小藤環，吸引眾香客圍觀。點炮者由抽籤選出。大約十時左右，開始點炮，只見健兒們爭搶，互不相讓。其中，搭人梯上屋頂最精彩。獲紅色藤環為冠軍，藍色藤環為亞軍，黃色藤環為季軍。冠軍獎品為燒豬、白酒一醒、大鏡屏一座；亞軍獎品為中鏡屏和白酒一醒；季軍獎品為細鏡屏和白酒一醒。獎品統一由組織者敲鑼打鼓送至該村。晚上，各村村民還會到大沙地戲棚看做大戲。據老人講，抗戰前，看粵劇是免費的。抗戰勝利後，因邀請省港班上演，故要

<sup>65</sup> 無名氏，《五虎平西平南》（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前言頁1。

<sup>66</sup> 陳藻，〈話說沙灣螺陽鄉〉，頁96-97。

收費。同日，岐頭侯王誕也很熱鬧，下午上演粵劇折子戲，落幕時，演員紛紛在眾香客面前售賣膏、丹、丸、散。以上民間活動於1948年便被迫停止了。<sup>⑥7</sup>

由侯王的來歷和螺陽七鄉侯王誕祭祀儀式可知，侯王叫做「李公侯王」，原來是渡頭李氏宗族的神，該信仰隨着渡頭地位的提升而向螺陽社四鄰擴大影響，其形象被鄉民塑造成為具有磚瓦行業特性的「火神」形象，逐漸成為磚瓦業（特別是工方生瓦行）的保護神。侯王誕期渡頭做大戲、燒大炮，岐頭唱八音，岐山做木偶戲，<sup>⑥8</sup>三個村落在七鄉中配合得相對更為緊密。通過搶花炮的儀式，螺陽七鄉均得到侯王的庇蔭，最後變成七鄉共同奉祀的神明。侯王信仰加上師傅廟的大禹崇拜，使作為螺陽社中心的渡頭，同時亦成為南岸磚瓦行業神祭祀中心。侯王、大禹、關帝三大磚瓦業行業神，以及螺陽社各鄉的神明各有分工，它們不但是南岸磚瓦行業村落聯盟的象徵，也是螺陽社各鄉社區認同的象徵。從1946年螺陽社的中秋魚燈出會可見到七鄉仍是一個聯繫緊密鄉村聯盟。<sup>⑥9</sup>（參見附圖3）

### （三）北岸部份村落的華光神崇拜

據《番禺縣鎮村志》及田野考察匯總<sup>⑦0</sup>所製「南山峽北岸磚瓦業村落民間信仰與龍船會對照簡表」（參見附表2）可知，與南山峽南岸地區相比較，北岸地區並沒有比較統一的區域性行業神崇拜，主要是因為這些村落分屬幾個不同的社。（具體情況在後文詳述）比較值得關注的是華光。華光是佛教華光菩薩，亦名「五顯靈官如來」，後世將之與五顯神混為一談。<sup>⑦1</sup>華光還與五顯一起供奉。五顯原指：顯聰昭聖孚仁福善王、顯明昭聖孚義福善王、顯正昭聖孚智福善王、顯直昭聖孚愛福善王、顯德昭聖孚信福善王，與

⑥7 陳藻，〈沙灣螺陽七鄉誕會與民間藝術〉，載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番禺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番禺民間信仰與誕會文集》（廣州：廣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頁159-161。

⑥8 曾家豪、曾秉，《龍岐村簡志》，頁3。

⑥9 陳藻，〈沙灣螺陽七鄉誕會與民間藝術〉，頁159-161。

⑦0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番禺縣鎮村志》，頁91-99；訪談筆記：李敬儔，2018年8月22日，南山村；訪談筆記：黎達威（時年77歲）、劉鉅枝（時年46歲），2012年2月10日，沙頭街文體中心。

⑦1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下冊，頁544-545。

華光即「上善王顯頭官大帝」統稱為「五顯華光大帝」，故各地供奉其神位的廟宇取名為「五顯宮」。

在珠三角地區五顯華光一般被當作火神立廟祭祀。清乾隆年間，番禺人車騰芳在〈華光廟祝神記〉中說：

吾粵多華光之神，廟號以帝冊封，不知始於何時？世俗所傳，事涉荒誕，非儒者所道。大約華光火神也。粵為火國，其神祝融，而帝實秉火德，能司火功，以為民禦災捍患，故其廟始於都邑，偏於鄉間，使人奔走乞靈而不自已……<sup>⑫</sup>

又據同治《番禺縣志》載：

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即燦燦之謂也。況艮為少男，介居西北（先天卦艮在西北），正為金旺火衰之地。觀神之形狀衣服，可見世人以為「火神」，誤矣。且「火神」另有專祀，又何以「華光」為「火神」也？然神固靈著也，遇火災之際，籲神呼救，無不立應，雖延燒成墟，而神廟巋然獨存。故窮鄉僻壤，莫不建廟以祀。道家言，「神姓陳，為元武諸將」，其亦取「金水相生」之義歟。（據《粵小記》修）<sup>⑬</sup>

在南山峽北岸從事磚瓦業的村落中，有一部份從事磚瓦生產的村落建有祭祀火神五顯華光的廟宇。如一直屬同風社的汀根、玉棠及先後歸親仁社和同風社的蓮湖<sup>⑭</sup>等村均建有華帝殿，其中蓮湖村正月十六為華光誕，1949年前有出會。今南雙玉行政村的玉棠村金馬里有「華帝殿」（改革開放後原址重建）主祀華光大帝（觀音殿主祀觀音，附祀禾花和天后），為該村的「村主菩薩」無疑，農曆六月二十為華光誕。玉棠村文華里五帥府古廟（改革開放後原址重建）內祀五帥也包括華光在內，據說該村的華光有五兄弟，但並非是前文所說的「五顯」，而是五位元帥：除了華光之外，居中為康公主

⑫ 乾隆《番禺縣志》，卷19，〈藝文三·華光廟祝神記〉，頁482。

⑬ 同治《番禺縣志》，卷54，〈雜記二〉，頁676。

⑭ 2015年5月22日，筆者實地考察了蓮湖村發現高氏宗祠東側有一座近年建的一座類似「酒堂」的建築物，門口橫額上書「蓮溪金靈堂」，對聯寫着「華光座鎮掃陰霾，觀音撒露現曙光」，顯示蓮湖村可能原來有供奉華光和觀音的廟宇。



帥，其餘為趙公元帥（右）、溫元帥、馬元帥（左）（附祀關帝和觀音）。鄰近玉棠的雙坑的「村主菩薩」為天后，現存天后古廟（改革開放後遷建），雖然主祀天后，但是在襯廟裡還附祀車公和華光。<sup>⑤</sup> 由此可見，在同樣屬於同風社並從事磚瓦業的雙坑、玉棠、汀根、蓮湖有火神華光的祭祀，其中汀根、蓮湖、玉棠有專門的廟宇祭祀。

汀根村現存的華光廟為1994年重建，《重建華光古廟碑誌》上說該廟始建於建村之時。但從僅存於頭門的舊石匾上書「華帝殿」三字的時間為「嘉慶歲在丙子，桂月吉日重修」，可知汀根華帝殿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九月重修，早於此前已經存在。在華帝殿前有一座社稷壇，裡面同時還供奉着一塊石頭，可見華帝殿的出現與明清汀根的社稷祭祀有密切關聯，甚至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廟建築。據村民回憶，1949年前汀根與南山峽地區南北兩岸大多數村落一樣參與了磚瓦業。在村民的記憶中，民國中期該村就有磚瓦窯存在。該村各姓的族人中，就有不少在南山峽、南莊沿岸開瓦窯和從事水運。由於磚瓦的燒製依靠火，火神華光崇拜的出現與該村的磚瓦業有着密切的關係，華光神也逐漸成為汀根黎、梁、劉、余、杜五大姓的「村主菩薩」。

汀根村民還對五顯華光的形象進行了地方化的塑造。他們認為華帝殿內祀的華光大帝全稱「五顯華光蕭大元帥」或「飛天風火蕭大元帥」，原有朱、蕭、陳、馬、鄭五兄弟。<sup>⑥</sup> 這五兄弟並非前述的五顯，筆者暫時不能肯定汀根華光的所謂「五兄弟」究竟是代表本村的五個姓氏，還是祭祀華光的五條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汀根梁、黎、杜、劉、余五姓共同的村主菩薩是華光大帝。該村華光廟門的左右對聯即為「神靈注五通威揚中土，火德昭三寐（原文如此，應為「昧」）法掌南天」。據說因為華光造像是在沙墟選擇木材雕刻的，所以村民說汀根華光大帝的「外家」是沙墟。

清末以來，汀根逐漸形成五大姓氏輪值華光誕巡遊的慣例。汀根華光本來沒有固定的「座宮」，現在廟宇原址只是華光的「行宮」。五大姓都在自己的祠堂旁邊建有專門的「神廳」用於停放華光行宮（神像）。1949年前的最後一次「傳統」的華光誕出會是1948年。每年出會前組織者都會通過擲杯筊占卜，得到神的授意後方能舉辦。出會隊伍由各姓氏籌資購置或租賃，如鍾村康公出會後的出會儀仗隊就大部份由汀根租賃。另外，還會派專人到市橋訂做花轎。出會的前一天（農曆正月十九）下午五點左右，往年當值的姓

<sup>⑤</sup> 訪談筆記：李敬偉，2018年8月22日，南山村。

<sup>⑥</sup> 訪談筆記：黎達威、劉鉅枝，2012年2月10日，沙頭街文體中心。

氏先將華光行宮由自己的神廳抬到當年當值的姓氏神廳中，晚上為華光沐浴更衣。農曆正月二十誕會正式開始。出會巡遊前眾獅隊會在華光廟前採青，焚香禱告。隊伍一般由當甲的姓氏隊伍先行，大體順序是：令旗、頭牌、彩旗隊、鳴鑼、淨瓶隊、花籃隊、生花彩扇，彩櫃、華光鑾駕，銃隊（一百多支），當值姓氏太公上甲耆老（50歲），屏色隊、馬色隊伍（最多時有140多匹馬），獅隊（過去是請別的獅隊，現在由各姓氏自己組織，早期還有鼈魚隊）。1949年前，出會巡遊隊伍環繞全村一周：路線起點在細廟（華光廟行宮），往南經過青雲大街、梁氏宗祠（不入），到東橋大街，向東街、北街、五龍街、深邊街，回到寧仁大街，最後回廟。沿途也會有獅子採青，各姓氏的祠堂都有掛青（生菜），各家各戶準備貢品迎接華光神駕到來。值得注意的是，農曆正月二十當天沙灣何氏（沙灣鄉也有華光廟）會派人前來汀根看出會，抄寫對聯。華光誕期間，還會請戲班來演「神功戲」，傳統大戲一般由各姓氏太公蒸嘗籌資。演戲期間，會請神出來睇戲。

從1948年汀根的華光崇拜及其儀式我們不但可以看到當地的宗族社區結構，也可以間接了解到汀根與那些同樣位於南山峽北岸的村落都參與磚瓦生產。儘管由於磚瓦業的消失，華光誕已經遠離了祭祀火神的傳統，但從2013年和2015年的誕會活動中，我們仍能感知它依舊是當地五大姓氏建立社區認同的重要儀式。<sup>⑦</sup>

### 三、南山峽地區磚瓦業的水運網絡、船難傳說與南山峽口河神崇拜

#### （一）南山峽地區磚瓦業的水運網絡

同治《番禺縣志》對番禺縣的水路有詳盡的描述，其中就有關於大箍圍南水，即沙灣（市橋）水道，及其相溝通的水網的描寫，為我們勾畫出一幅清代水運網絡的圖景：

……大箍圍西水自神頭南流經永清汛，有南海季華堡南水由西北而來入之，屈東南流過石壁，又東南流經韋涌，其西岸林岳諸村

<sup>⑦</sup> 以上關於汀根華光廟歷史演變和誕會儀式均參見朱光文，〈汀根華光誕出會概況〉，載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番禺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番禺民間信仰與誕會文集》，頁23-26。

為南海境。大籬圍西水又東南流經屏山，有順德之陳村文海水自西來入之。又南分為二，一東南流經抱旗山，又東南入南山峽，又屈東流紅羅嶂、青羅嶂兩山夾之，是為大籬圍南水，又東經市橋，又東南流至沙墟……<sup>78</sup>

除此之外，在南山峽地區南北兩岸也有多條河涌與市橋水道和沙灣水道相連通，如南山峽北岸的蓮湖涌、沙頭涌、市橋西涌、市橋東涌、沙墟涌、石崗涌、新橋涌，南山峽南岸的岐頭涌、蘭陵涌等。

這個水運網絡對明清番禺縣沙灣司沙灣（市橋）水道沿線的村落產生重大的影響，也影響到南山峽一河兩岸磚瓦業生產原材料、燃料乃至產品、銷售水上運輸網絡。其中，磚瓦業原材料方面，南山峽地區的磚瓦的主要原料是泥。泥分白泥與赤泥。過去有名的白泥瓦是由東莞縣峽口運來的。造赤泥瓦及瓦筒的赤泥多來自本縣的小洲、土瓜（即土華）。造大階磚的泥是用東莞麻涌的泥。造紅磚用的泥多來自順德的「老桑基」泥及大量的用本縣鄰近農村的「基泥」。沙灣埠向來講究質量，用什麼原料生產什麼產品，是有一定規矩的。<sup>79</sup> 褚鏡認為，「有條磚泥、階磚和赤泥瓦泥、瓦筒泥、白泥瓦泥等等。此種原料泥來自東莞石龍、南崗、小洲、土華、西海等處」。<sup>80</sup> 磚瓦業所用陶土，大部份是禺北石馬、東莞峽口的黃白泥，全盛時期，有土窯五十多座，年產磚（瓦）達二千萬塊，質量甚佳，享有盛譽。<sup>81</sup> 可見，南山峽地區的磚瓦業所需的原材料絕大部份來自番禺縣內，包括禺南的小洲、土瓜（今土華），禺東的南崗和禺北的石馬，以及鄰近的順德西海、東莞石龍、峽口等歷史上通過水路可以到達的珠三角各地。這些泥均通過船運抵南山峽南北兩岸的埠頭，然後搬運到製作磚瓦的村落進行製作和燒製，形成成品再銷往珠三角各地。

磚瓦業的燃料，最初「是從西江（雲浮、郁南、高要、德慶）一帶的山區採購松樹尾，用大木船運返作燃料的。亦有西江本地商人專門購運送上門的。以後，由於窯的改革及成本運輸等諸多問題，逐漸改燒禾稈、茅草作燃料。這些禾稈、茅草主要來於中山、東莞及本地，且貨源充足」。<sup>82</sup> 「燃料

<sup>78</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5，〈輿地略三·川〉，頁37。

<sup>79</sup> 李家達，〈五十年來渡頭磚瓦業的情況〉，頁104。

<sup>80</sup> 褚鏡，〈解放前後禺南沙灣埠磚瓦生產情況〉，頁108。

<sup>81</sup> 龍卓傑，〈明清·渡頭「四埠」磚瓦窯址〉，頁48。

<sup>82</sup> 李家達，〈五十年來渡頭磚瓦業的情況〉，頁104。

則有禾稈、松丫、蕉葉、茅草、蔗麩等，這些多來自西江一帶，如開封、雲浮、德慶等縣，其次來自萬頃沙、二沙及附近各沙區等。日需用量大，平常市度，為這行運輸原、燃料船隻百餘艘，使整個北海煞是熱鬧。」<sup>③</sup> 對比原材料，磚瓦業的燃料主要來自西江中游沿岸，而改革燃料後（可能是民國時期的情況），為了降低成本，燃料轉向集中於珠三角沙田產糧區。

至於磚瓦產品銷售的水運網絡，「本埠產品除本地銷外，很大一部份是向外輸出的，除銷番禺、順德、東莞外，還銷售於本省各大中小城市，甚至港澳等地。四邑僑鄉亦多來此採購」。<sup>④</sup> 磚瓦產品由各家窯口因水路的需求而生產，「有以白泥瓦片、瓦筒、階磚為主，有以赤泥階磚等為主，各有不同銷路。……白泥瓦和瓦筒、階磚的上價貨，銷往僑鄉中山縣、江門三埠，中、下價貨則銷附近各縣和廣州、佛山、港澳等地」。<sup>⑤</sup>

綜上所述，無論是磚瓦業的原材料、燃料及產品的銷售均通過水運來完成。如果把南山峽地區磚瓦業的原材料、燃料和產品銷售的路線疊加起來，可以發現南山峽地區人們通過水路與省內各地形成一張完整的水運網絡，尤其是從市橋水道沿岸出發去往廣州、佛山、順德、南海，乃至西江中上游等西北方向，南山峽都是必經之路。

## （二）南山峽地區的船難傳說與河神崇拜的形成

南山峽口一帶地屬南山村。如前所述，南山峽口較早出現的宗教建築是元代至明初的南山覺海尼寺。<sup>⑥</sup> 明初以後屢毀屢建，最後歸於湮沒。到嘉靖年間，南山鄉創建了林大相公廟，祭祀在此溺水遇難的亡靈，改革開放後還能見到嘉靖年間的碑記。<sup>⑦</sup> 關於該廟的來歷有這樣一個傳說，明代有一位姓林的進士（另一說法是秀才）考取功名後還鄉祭祖，船經南山峽時被風浪捲沉。為了紀念這位翻船溺亡的林姓進士，鄉人在南山峽口建成「林大相公廟」。<sup>⑧</sup> 到雍正四年（1726），由於水運的需要，南山峽口出現了另外一座神廟——南山峽口天后宮，由南山村崔氏始祖創建，為「南山鄉香火也」<sup>⑨</sup>。這座

<sup>③</sup> 褚鏡，〈解放前後禺南沙灣埠磚瓦生產情況〉，頁108。

<sup>④</sup> 李家達，〈五十年來渡頭磚瓦業的情況〉，頁104。

<sup>⑤</sup> 褚鏡，〈解放前後禺南沙灣埠磚瓦生產情況〉，頁108。

<sup>⑥</sup> 成化《廣州志》，卷25，〈番禺縣·寺〉，頁1066。

<sup>⑦</sup> 訪談筆記：李敬儔，2018年8月22日，南山村。

<sup>⑧</sup>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番禺縣鎮村志》，頁99。

<sup>⑨</sup> 《南山峽口古廟碑記》。

「林大相公廟」和南山峽口天后宮一樣原來都是南山鄉的神廟。

與此同時，除了南山鄉民之外，途經的船員也參與到「林大相公廟」的傳說建構中。由於南山峽口常常發生溺水事件，人們都相信南山峽水下有個洞，洞內藏有「烏忌」和「白忌」兩條怪魚，雨天必出水興風作浪，林大相公等一船人就是被怪魚捲入河底的。<sup>⑩</sup>

在清代，附近地區扒龍船的村落經過南山峽時也會發生沉船情況，於是就有了一個與龍舟有關的「咚咚廟傳說」。據傳說，附近的村民在海上拾獲一條「沉沙木」，當時老人建議用此木建祠堂，年輕人則主張造龍船，最後造的龍舟在試航時路過南山峽，龍船只是一聲鼓響便連轉三個彎後隨即沉沒。此後，村民每年農曆五月前後不論白天黑夜都聽聞龍船鼓聲。於是村民在此建廟，稱該廟為「咚咚廟」。<sup>⑪</sup>《沙灣鎮志》也記載了南山古廟的扒龍舟船難傳說，不過船難的主角是沙灣鄉的龍船手：曾有沙灣扒龍船「一鼓轉三灣」的神奇傳說。相傳清初，沙灣人在甘崗海（沙灣鎮前的河道）賽龍舟，有人精心設計了一隻「飛龍」，這飛龍逢賽必勝。有一次，這飛龍以十分迅猛的速度沖過大灣（大灣為今磷肥廠鳳山苑址的一條自然村，於百多年前湮沒），繞過龍灣，抵達南山峽時不幸失事。事後，人們為了紀念這飛龍，且攝於神靈，在南山峽北面建了「南山古廟」。<sup>⑫</sup>

前面提到南山峽口「南山覺海尼寺」明初重建，復毀於寇的情況<sup>⑬</sup>，說明南山峽地區不但地勢險要，水流湍急，而且盜寇出沒，常有船隻沉沒，可謂由來已久。不管是「林大相公廟」的傳說，還是「咚咚廟」的傳說，或是河底藏有「烏忌」和「白忌」兩條怪魚的傳說，其實都折射了南山峽作為水運要道，但卻船難多發的歷史事實。前面所說的林大相公廟其實是一個非常簡陋的小廟。到乾隆年間，林大相公廟被改建成一座花崗岩石板砌築而成、型制與單間瓦房相仿的神龕式小廟，該廟門額上書「南山古廟」四字，有陰刻對聯一副，右書「人間施惠澤」，左書「海若顯靈通」，顯示該廟「海神」或「河神」崇拜的特質。對聯兩側分別刻「乾隆壬子立」、「光緒癸巳

⑩ 陳藻，〈南山峽與南山古廟的故事〉，《番禺日報》，2012年7月7日，版4。

⑪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番禺縣鎮村志》，頁99。

⑫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494-495。據筆者採訪市頭村蔣冠華先生，類似的傳說，在市頭沙邊村也有。而《越華報》（1936年6月27日）也載有一篇署名為焜耀所寫〈一段扒龍船後史〉，也講了同一地點類似的傳說，不過，以上兩個版本的主角前者是沙邊村，後者是塘步村。

⑬ 成化《廣州志》，卷25，〈番禺縣·寺〉，頁1066。

仲夏重修」的題字，說明該廟至遲建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於光緒十九年（1893）重修。<sup>⑭</sup>

如前文所述，南山為整個南山峽地區磚瓦業的發源地之一，南山古廟的出現與這裡獨特的水運地理位置、磚瓦業繁盛等條件是密不可分的。南山峽兩岸磚瓦業生產的原材料、燃料、成品的運輸，以及市橋水道下游的臨江村落，都要依靠南山峽的便利水運條件與廣州、佛山等珠三角乃至西江中上游地區聯繫。南山古廟自建成以來其內供奉的神明就逐漸演變成南山峽一河兩岸以及市橋水道沿岸村落的水上保護神，幾乎所有從事水上運輸的船隻（包括客船）都去拜祭。而從事磚瓦業（包括運輸磚瓦原材料、燃料、磚瓦成品）的帆船主經過必定到南山古廟拜祭。直到民國時期，南山峽口為市橋通往廣州或西面（俗稱「西海」）等珠三角腹地航線的必經之道，土匪多在此處洗劫客輪。<sup>⑮</sup> 1949年，南山峽一帶「西海航線，為市橋經穗之交通孔道，隆冬沙乾水淺，航行經常有擱淺達數小時之久，行旅戒心，恐有土匪乘機洗劫之虞」<sup>⑯</sup>。過去駕船人過南山峽口，船尾拋放「稽錢」（俗稱陰司紙），機動船則要慢速，減弱噪音航行。<sup>⑰</sup>

綜上所述，由於南山峽的地勢險要，船難多發、盜寇橫行，奠定了南山峽地區河神崇拜的基礎。明代中葉以來，南山鄉民、包括磚瓦業運輸在內、途徑南山峽的船員、各地扒龍舟途經的鄉民共同塑造了南山古廟的形象：由明嘉靖年間南山村民祭祀溺水亡靈的一鄉之簡陋小廟（林大相公廟），到乾隆、光緒年間被逐漸塑造成供奉南山峽一河兩岸及周邊區域共同的水運保護神的神廟，後被改建成石砌神龕式小廟。在這過程中，南山古廟供奉的神明也成為了南山峽地區扒龍船村落的龍船保護神。

⑭ 2011至2012年，當地以沙墟為首的龍船會集資在小廟外增建了一座更大的仿古一進建築，並於廟前興建廣場。

⑮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256。

⑯ 何本仁等，〈大會提案：民政類第五號〉，《新番禺月刊》，第2期（民國三十八年〔1949〕1月），頁29。

⑰ 陳藻，〈南山峽與南山古廟的故事〉。

## 四、沙灣司村社的分合變遷與兩岸龍船會的形成和「採青」、「請龍」儀式

### (一) 清代以來市橋水道北岸村社的分合變遷、村際關係與北岸村落聯盟的形成

清嘉慶年間珠江三角洲鄉村團練的興起與張保海盜集團侵襲內河以及槍炮擴散有直接的關係。<sup>98</sup> 嘉慶十四年（1809），沙灣鄉何、黎、王、李等姓就設立了仁讓公局組織地方聯防。<sup>99</sup> 到了嘉慶以後，特別是洪兵之亂前後，大穀圍地區的社學團練就逐漸普遍起來，也就是楊念群所強調的晚清珠三角地區「鄉約軍事化」的相關情形。<sup>100</sup> 其中，南山峽市橋水道北岸的村社構成比較複雜，分屬清代沙灣司不同的「鄉約式社學（書院）」，如石崗和沙墟一直屬平康社，而傍江和新橋一直屬同安社。<sup>101</sup> 跨鄉「鄉約式社學」普遍建立的基礎是村落鄉約組織的普遍建立，如北岸橫江村的村主菩薩是車公，車公廟在當地就被稱為「鄉約古廟」，是當地黃、黎、麥、何、朱等姓「九約」共同祭祀的神明，體現了鄉約與社廟的結合。<sup>102</sup> 在這一地區的「鄉約」或「約」成為一個可大可小的概念，不但一個村落可以分為若干個「約」，而且由村落聯盟中的單個村落（鄉）也可以「約」的形式出現。

在海盜入侵的同時，在沙灣司甚至大穀圍地區更廣大的區域社會盜亂不斷，期間又出現大族、大鄉欺壓社內的小族、小鄉的情況，這是促成地方軍事化的根本原因。南山峽北岸大部份村落姓氏族群宋元以來均有頻繁的遷徙經歷，而且村落宗族普遍都比較弱小。<sup>103</sup> 小鄉、小族為了抵禦盜匪及大族、大鄉欺壓，脫離原來的村社組織，重新組合成新的村落聯盟。或在原有的鄉約式的「社」基礎上建立與之對應的「社學」形成團練組織自保，或部份弱小村落從社中析出互相抱團，或依附大鄉、大族以自保，由此觸發了村社組

<sup>98</sup> 科大衛著，卜永堅譯，《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366。

<sup>99</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6，〈建置略三·社學〉，頁187。

<sup>100</sup> 楊念群，〈論十九世紀嶺南鄉約的軍事化——中英衝突的一個區域性結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頁114-121。

<sup>101</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6，〈建置略三〉，頁186-187；民國《番禺縣續志》，卷2，〈輿地志二〉，頁56。

<sup>102</sup> 田野筆記：2018年8月22日，橫江村。

<sup>103</sup>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番禺縣鎮村志》，頁97-99。

織成員出現分化、瓦解、重組等比較頻繁的變化。如汀根、南山、雙崗（即雙坑，又名雙溪）、玉棠清末一直屬同風社。<sup>⑩</sup> 橫江、蓮湖道光二十八年（1841）原屬親仁社<sup>⑪</sup>，後屬同風社。<sup>⑫</sup> 沙頭（又名碧沙）、土涌、北海（又名北津），大富（又名北浦）道光二十八年（1841）原屬親仁社<sup>⑬</sup>，到咸豐三年（1853）大富、北海、沙頭、土涌等參與合建平康社學，組成市橋、沙墟等周邊二十四鄉同建的地方團練組織。<sup>⑭</su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年間主要從沙灣司親仁社和後來的平康社等內部析出了並非以「社」而是「會」的名義建立的村落聯盟，如「十鄉（約）會」、「五（七）鄉（約）會」，<sup>⑮</sup> 由原分屬沙灣司不同村社組織的村落組成的市橋水道北岸龍船會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形成的。

當然，兩大龍船會的形成不但與兩岸的磚瓦業水運有關，而且還牽涉到市橋水道沿岸地區依賴水運生存的更大範圍的臨水村落。以上這些北岸的村落中，橫江、汀根、南山、玉堂、雙坑雖然都從事磚瓦生產，都是臨水村落或有河涌連接市橋水道，但都不是北岸龍船會的成員。南山村原來在清代有龍舟，後來龍舟被盜後就再無扒龍舟了。<sup>⑯</sup> 同屬北岸、並不從事磚瓦業的沙頭、沙墟、石崗、傍江、新橋等村落卻是龍船會的成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上這些龍船會的成員均位於市橋水道沿線，都有河涌與水道相通，屬於同一水運網絡。北岸龍船會的有些村落很可能與磚瓦業有密切聯繫。如新橋以前做草繩、草席，從萬頃沙運來兩米多長的水草做原料。<sup>⑰</sup> 民國《番禺縣續志》載：「絞繩業，分麻繩、草繩兩種，盛於新橋、大山、土華、小洲，以新橋為最多，一鄉所出，足供全邑之用。」<sup>⑱</sup> 新橋的絞繩業可以為上游的磚瓦業提供捆紮運輸的材料。新橋同沙墟關係很好，如結拜兄弟。蓮湖最早有磚廠，以前幫過新橋做磚廠。解放前，蓮湖屬汀根（自然村），而汀根欺負

⑩ 同治《番禺縣志》，卷16，〈建置略三·社學〉，頁187；民國《番禺縣續志》，卷2，〈輿地志二〉，頁56。

⑪ 同治《番禺縣志》，卷16，〈建置略三·社學〉，頁187。

⑫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2，〈輿地志二〉，頁56。

⑬ 同治《番禺縣志》，卷16，〈建置略三·社學〉，頁187。

⑭ 同治《番禺縣志》，卷16，〈建置略三·平康社學敘略〉，頁186-187。

⑮ 關於沙灣司各社的分合變遷，筆者擬另文再詳細論述。

⑯ 訪談筆記：李敬偉，2018年8月22日，南山村。

⑰ 訪談筆記：陳廣發，2016年7月1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⑱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12，〈實業志·工商業〉，頁188。



蓮湖，蓮湖則邀請十村幫手。<sup>⑬</sup>這也可能是汀根雖然屬北岸且做磚瓦但不扒龍舟並前往南山古廟「請龍」、「採青」的原因。也不排除以上部份村落從事磚瓦業原材料、燃料、成品銷售方面的運輸。這些村落均位於北岸，故名「北岸龍船會」。

至於同屬北岸、但不屬北岸龍船會的市橋清代中後期一直都有水上鳳船水色祭祀天后的習俗。<sup>⑭</sup>這裡主要是造船基地。民國《番禺縣續志》亦提到清末民初市橋的造船業：「其次則造船……市橋、新洲等處亦均有之，但不及河南之盛。」<sup>⑮</sup>市橋的造船業主要集中在南便基（今南堤路）深涌口以東一帶。能製造出海漁船（俗稱大眼雞三支桅）和較大的內河貨船。民國時期仍有大小船廠數十間，較大的有新順隆、富興隆、生記等船廠，從業者一百多人（不含臨時工）。當時船體雖以木結構為主，但已能製造有螺旋槳發動機設備的出海漁船、載重數十噸的內河貨船和維修花尾渡等。<sup>⑯</sup>雖然歷史上市橋也有磚瓦（紅磚廠），但是市橋鄉只有一部份的宗族或坊社有扒龍船傳統，直到20世紀20年代，也只有雲瑞門、白鶴社兩個社區在端午節有扒龍船的習俗。<sup>⑰</sup>曾流傳「白鶴護龍船的傳說」說明市橋白鶴社曾經有過名為「白鶴仔」龍船參與過「一河三岸」的北海景競渡，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停止，現龍船仍埋藏在市橋清河路地下。<sup>⑱</sup>

北岸龍船會的村落之間的聯盟關係，在淪陷時期「市橋皇帝」李塑雞（即李輔群）統治市橋時現得更為明顯：

我鎮（指原石碁鎮）的新橋、傍江東、傍西、石崗東、石崗、西村，市橋鎮的沙圩、沙頭、蓮湖及北海等村組成一個龍船會，每

<sup>⑬</sup> 訪談筆記：陳廣發，2016年7月1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sup>⑭</sup> 乾隆《番禺縣志》，卷20，〈雜記·市橋鳳船〉，頁567載：「……定於端陽節內游鎮海面，一時遊人匝匝，畫舸迷津，稱為勝會。然必十餘年卜於神，神許乃舉，舉必歲登，不許則居民搖手相戒以為逆神。」可知，乾隆年間鳳船和水色巡遊為十餘年向天后神占卜一次，而且還要看經濟是否允許。可以猜測起碼十多年才舉辦一次。而同時知道，舉辦水色其實是在端午節期間，而非後來的天后誕日，這說明乾隆年間的鳳船和水色既與祭祀天后相結合，已成為市橋鄉的端午節一項主要民俗活動。

<sup>⑮</sup>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12，〈實業志·工商業〉，頁189。

<sup>⑯</sup>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番禺縣鎮村志》，頁46-47。

<sup>⑰</sup> 韓健，〈二十年代的舊市橋（1921-1930）〉，載番禺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番禺文史資料》（1990），第8期，頁151-158。

<sup>⑱</sup> 梁謀，〈白鶴護龍船的傳說〉，載梁謀，《禺山雜記》（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2007），頁69。

年端午節時都有扒龍船及賽龍船的風俗習慣。龍船會一向本着互助互諒的精神，保持着密切關係，如某村發生沉船或撞船傷人事故，各村都派出代表捐款送物，從來沒有發生爭執而拔刀相向……正因為龍船內部團結，就連當年市橋皇帝——李塋雞不敢輕易招惹龍船會。每年在北海扒龍船時，李塋雞都去看龍船，但他的船隻（電船）也不敢亂闖亂停，也得聽從龍船會的安排指揮。有一次，在沙墟扒龍船時，沙墟的村民與李塋雞的爪牙發生了摩擦。第二天龍船要扒去沙頭，必須經過李塋雞群園的河面，有人擔心李塋雞到時會報復。為了安全，龍船會便集中商討對策，在龍船來回的過程中，都有意安排沙墟的龍船在中間，其他村的分別在兩旁保護，另沙墟等地村民也作好充份準備，如李塋雞一動手，他們便立即從四面八方攻入市橋，直搗李塋雞老巢。後經市橋商會多次調解，而且有懼於龍船會人多勢眾，李塋雞也不敢亂來。<sup>⑩</sup>

由上可知，北岸龍船會部份成員村落與李塋雞集團關係之緊張，而且這種對抗似乎處在勢均力敵的狀態，甚至因為北岸龍船會的團結，李塋雞有時還處於下風。從中調解的「市橋商會」的角色就比較微妙。李塋雞其實也有向北岸龍船會妥協的時候，但是由於李塋雞「漢奸」的角色，十鄉龍船會似乎並沒有領情，由此加劇了雙方的矛盾。在此過程中，李塋雞集團曾借助地方社會的文化網絡，試圖緩和與北岸各村的緊張關係：

淪陷期間李塋雞為粉飾太平，擬於端陽節日邀市橋附近「七鄉龍船」（建國後沙墟、傍江、石崗各自分出兩村，變成今天的「十鄉龍船」）到「皇宮」群園（李塋雞住宅）的江面劃船競渡，以示「與民同樂」。但七鄉群眾不屑與漢奸同樂共慶端陽而婉拒。為此結下怨恨。李塋雞從外鄉請來兩艘烏黑色的加長龍船，還請來百多名擅長劃槳的彪形大漢，企圖乘七鄉龍船在碧沙競渡之日，各船從沙墟扒往碧沙必定取道市橋河之機，賽贏七鄉各船，以助主子發洩憤懣。市橋「大天二」黃志達（花名「受難保」）聞知此事，便湊熱鬧推波助瀾。他與陳某某公開打賭：若大黑船取勝，他則奉贈酒

<sup>⑩</sup> 石碁文化站，〈龍船會及新橋扒龍船〉，載石碁文化站編，《岐山拾趣》（1993），頁99-103。

筵三席，否則由陳某某認輸埋單睇數。七鄉龍船會知悉後，合謀六鄉之船先由沙墟出發，依次間隔進入市橋，每次全速與之勁拼，最後以船速快捷見稱，薄殼單旁的石崗「毬山清河」殿後，與之全拼，實行以「猛將戰疲兵」的策略挫敗了對方。<sup>⑫</sup>

在整個對抗李塋雞集團的過程中，作為大族、大鄉的沙墟在龍船會始終處於領袖的地位，與李塋雞集團的對抗也更為激烈。據說李塋雞佔據市橋時就曾經想進攻沙墟。而沙墟前往南山古廟「請龍」經過市橋水道的時候，不從靠近市橋的北面的水道過，而從靠近南郊北面的水道過，且從不調頭。<sup>⑬</sup>

## （二）清末以來南岸地區的村社組織與村際關係

與北岸龍船會相比，南岸龍船會的構成就相對簡單。南岸地區，即今沙灣地區，是與市橋臺地以市橋水道隔開、以青蘿嶂為凝聚核形成的離島。據民國《番禺縣續志》載：

縣治之南六十里，曰「南山峽」，層巒疊嶂，夾岸對峙，狀若門闕。峽之左為「大籬圍」，連村百數，不可勝紀；右則「小籬圍」，又曰「內沙灣」。倚山為屏，望衡而居，曰碧山，曰萬峽山，曰福田，曰新村，曰蘭陵，曰蘿村，大小七鄉（漏列南津），皆在螺山左右。<sup>⑭</sup>

據〈《渠園詩文鈔》序〉載：

禺山之陽，有大籬圍、小籬圍之稱。青蘿嶂在小籬圍中，特秀出岐陽一鄉，西視之則如屏，東面則控虎門。東西江縈合若帶，奔趨赴海，環繞在堂階之下。<sup>⑮</sup>

<sup>⑫</sup> 黎應榆，〈賽龍船會的故事，揚眉笑越虎頭洲〉，2010年6月8日，<http://bbs.py16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888>。

<sup>⑬</sup> 訪談筆記：陳廣發，2016年7月1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sup>⑭</sup>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10，〈學校志一〉，頁157。

<sup>⑮</sup>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687-689。

可見，直到清末民初南山峽南岸地區仍被稱為「小穀圍」或「小籬圍」，包括了沙灣鄉和螺陽社七鄉在內。

如上文所述，早在明末清初沙灣鄉與「七村」（即後來的螺陽社七鄉）關係就比較緊張。<sup>⑫</sup>清道光、咸豐年間，為抵禦洪兵之亂及其引起的盜寇問題，南山峽兩岸及下游村落紛紛成立社學，作為鄉村聯盟防禦，其中包括南岸的螺陽社和北岸的同風社、親仁社、平康社、同安社等。民國《番禺縣續志》載：「螺陽社學，在南山峽下螺山之東。道光二十九年，合碧山、岐山、蘿村（按：即石湧）、福田、南津、新村、蘭陵七鄉合建……」<sup>⑬</sup>這座社學的倡議建立者是在十三行經營隆記茶行致富的行商、岐山人張殿銓。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在鄰鄉則力與本善、石橋兩鄉聯絡，又由岐山合福田、龍津、碧山、蘭陵、新村、石湧六鄉為七約，建螺陽社學，以統治之。建普濟會為會友喪葬費。復建三益、復益、江南、遼東、連枝五會，則螺陽團練有資」。<sup>⑭</sup>民國《番禺縣續志》又載，咸豐年間，張殿銓兄張殿經抵禦洪兵遇害：「咸豐四年，土匪（即洪兵）蜂起，蹂躪南津（即渡頭）、碧山（即岐山）等鄉，焚燒螺陽社學，將至岐山，殿經率鄉人抵禦，力戰槍斃匪首。匪遁，窮追遇害，而岐山遂安。」隨之，張殿銓又捐資將這座毀於戰火後的螺陽社學重建：「咸豐甲寅毀於賊火。丙辰又重修之……」<sup>⑮</sup>咸豐六年（1856）重建螺陽社學於渡頭之東，鄉人張鳳輝（張殿銓長子）為重建立碑記（今已毀）。<sup>⑯</sup>螺陽社大部份村落從事磚瓦業生產。張殿銓倡設螺陽社學的目的的一方面是為了團結七鄉抵禦盜匪，保護當地磚瓦業安全；另一方面，他在當地投資了物業，也是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早年岐山張族十三世張禦金在家鄉附近以經營布業為生，奠定了這個商人世家基礎：

禦金，字粵泰，號逸亭……公質直而知平，美鬚鬢，往來於市橋、南津（今渡頭）等鄉，業賣布，遇童叟婦女，無二價者。迄

<sup>⑫</sup> 〈留耕堂考〉，轉見沙灣何氏宗譜編委會編，《廬江沙灣何氏宗譜》（1996），卷3，〈文獻集〉，頁19。

<sup>⑬</sup>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10，〈學校志一〉，頁157。

<sup>⑭</sup> 張錫麟，《架園稿鈔》，卷下，〈序·先祖通守公事略〉，轉引自劉志偉，〈廣州隆記茶行事補〉，載廣州市博物館主編，《鎮海樓論稿》（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頁75。

<sup>⑮</sup> 張炳楠等，《張裕慶堂族譜》（乙房）（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刻本，民國四年〔1915〕重修），頁17。

<sup>⑯</sup>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7。

老，人稱為白鬚公，性勤儉，雖諸子卓能成立。未嘗自輟其業。<sup>⑫</sup>

十三行經營隆記茶行致富後，張殿銓除了設立螺陽社學外，還在家鄉「更專心行善。在鄉則全以石鋪路，護以磚牆；在族則獨力重修始祖祠廟，建一魁會，培育鄉族子弟。大隱（注：疑為「穩」字）潮田五十五畝，為其手置」。<sup>⑬</sup>同治年間（1862-1874），張殿銓之子張鳳華大規模投資商品性農業經營，範圍從北面的河南到南面的黃閣（包括家鄉岐山附近各鄉在內）的廣大地區。<sup>⑭</sup>

螺陽七鄉並不包括涌邊及沙灣。相傳涌邊村是替沙灣西村李氏看管太公山的，沙灣於是在涌邊附近購買田地，讓其耕種以自給自足，故涌邊被視為親近沙灣，而非「螺陽七鄉」的一份子，「當年涌邊如有事，七鄉一般不會理會。相反若是石涌被沙灣大村欺負，螺陽其餘六村都會群起相助」。從中可隱約感受到沙灣鄉與螺陽七鄉之間「相鄰但不相親」的微妙地緣關係。<sup>⑮</sup>在20世紀30年代李民雨主政番禺縣的時候也無法彌合螺陽七鄉與沙灣鄉之間的隔閡。當然，沙灣鄉與螺陽社也有聯合的時候。民國二十七年（1938），為了抵禦日偽軍，沙灣鄉仁讓公局（沙灣鄉四大宗族的聯防組織）與螺陽社七鄉在沙灣鄉東面的崩岡（員嶠山）下青龍廟（今已毀）舉行聯席會議，鍾村（今鍾村鎮）亦派人出席，訂下「八鄉聯防」計劃。<sup>⑯</sup>

### （三）民國時期兩岸龍船會的競爭與南山古廟龍舟儀式

南岸龍船會以清道光以來的螺陽社所屬村落為主體，既包括直接參與磚瓦業的村落，也包括間接參與的村落。<sup>⑰</sup>其中，渡頭李氏保南堂在清朝中晚期就已經建造了「一公一嶼」兩條船。後來「公船」被河對面某村盜走，只剩下「嶼船」一條來扒。第二次建造龍船在20世紀20年代末，後毀於上世紀

<sup>⑫</sup> 張炳楠等，《張裕慶堂族譜》（乙房），頁10。

<sup>⑬</sup> 張錫麟，《架園稿鈔》，卷下，〈序·先祖通守公事略〉，頁75。

<sup>⑭</sup> 張錫麟，《架園稿鈔》，卷下，〈序·先祖通守公事略〉；宣統《番禺縣續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卷21，〈人物志四·張殿銓〉，頁270。

<sup>⑮</sup> 李偉東，《話說沙灣鎮渡頭龍船——採訪當地龍船活動復興親歷者李森》（未刊稿，2018）。

<sup>⑯</sup>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13。

<sup>⑰</sup> 渡頭人森哥的採訪錄音顯示：1949年前，鍾村屏山的「紅鬚」和「白鬚」解放前都與沙灣龍船會一起的，也會到南山古廟請龍。

70年代初。<sup>135</sup>

1949年前，南山古廟作為市橋水道北岸地區臨水村落民眾的重要民間信仰，大部份鄉村在每年端午節都不約而同到南山古廟舉行「採青」和「請龍」儀式（又叫「採水」），一直堅持到淪陷時期。據陳廣發口述，沙灣那邊的南岸龍船會一直無份去南山古廟「請龍」。<sup>136</sup>而據渡頭人森哥的採訪錄音顯示：1949年前，南岸龍船會前往南山古廟「請龍」時，南山古廟位於南山村的人開的磚瓦廠內，磚廠人員還會熱情招呼「請龍」的龍船。<sup>137</sup>這說明南山古廟的控制權可能發生過改變。其中，北岸的龍船會在每年農曆四月的最後一天舉行「採青」、「請龍」儀式，沙頭、蓮湖、北海、沙墟、石崗（今共七條村）每年都去「請龍」。傍江、新橋雖然同沙墟、蓮湖等屬北岸龍船會，但是由於距離太遠，一直少去或不去南山古廟「請龍」，傍江只有羅姓年年去，傍江古、陳兩姓和新橋只是在「請龍」前拿一支旗過去。

兩岸龍船會各村在村中完成起龍、「請龍頭」儀式，吃完午飯後，陸續籌備祭品，包括炮竹、金銀衣紙、香燭等，各船鑼鼓齊鳴、百槳齊發，鞭炮齊鳴。各村的所有船員上龍舟就坐，請一位五福俱全的老者手提一桶水，拿着黃皮葉將桶裡的水由船頭撒到船尾，還每人分發一包紅梨，表示順順利利，再求一張平安符，夾在頭戴的新草帽上，以求平安大吉。隨後龍舟離岸駛向南山古廟。龍舟距離南山古廟約一公里時，鼓手不再擂鼓，改為用鼓棍敲打鼓邊，一路敲到南山古廟（而回程時則全程如常敲鼓）。到達南山古廟的岸邊後，先由船上剛新婚的船員（人數不限）拿着任意一面旗（包括：頭牌刺繡、羅傘、百竹旗）、銅鑼跟尾護送，爬上南山古廟附近的崗頂將旗插好，再在附近採摘龍船花等戴於帽子上方能下山，此為「採青」。（插旗主要寓意早生貴子，發展到現在也是一種龍舟採青報道的的方式）下山後，所有龍舟成員方可登陸，到南山古廟中擺燒豬、燒紙錢、敬香拜神，此為「請龍」。（過去還有撒粽儀式）最後在廟外燒炮仗，上船一路敲鑼打鼓劃回村中。<sup>138</sup>「請龍」儀式後，是兩大龍船會進行探親和「趁景」儀式。1949年前市橋水道兩岸扒龍船日子要比如今遲，甚至過了端午節（五月初五）正日，

<sup>135</sup> 李偉東，《話說沙灣鎮渡頭龍船——採訪當地龍船活動復興親歷者李森》。

<sup>136</sup> 訪談筆記：陳廣發，2016年7月1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sup>137</sup> 該錄音由李偉東先生提供。

<sup>138</sup> 據沙頭街文體中心，《番禺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南山古廟龍舟習俗申報書》（2013），筆者也參與該申報書的修改。

是農曆初十才開始。<sup>139</sup>

1949年前，南山峽南北兩岸（渡頭、北海）雖然大部份都做磚瓦，但是關係不是太好，民國初年，兩岸扒龍船由於水域、祭拜點等方面常常發生衝突。而渡頭—北海景是兩岸龍船會聚集而形成的一處最大的龍船景，往往也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方。陳濟棠治粵時期，南岸螺陽社渡頭人李民雨被委任為番禺縣縣長，1928年上任。岐山人張正時被委任為番禺縣一區區長。李民雨任內大力舉辦平民義學，支持家鄉傳統民俗活動。張正時是李民雨的得力助手，曾積極發展南山峽一帶的磚瓦業。渡頭先後開設了福生酒廠、太白酒莊、德盛米機、順利里撈纜廠、仁利鐵鋪、造船廠、小發電廠和磚瓦模具店、農具店等，成為番禺縣的民族工業基地。<sup>140</sup> 有一年適逢渡頭龍船景，李民雨自掏腰包招待達官貴人從省城廣州遠道而來看渡頭龍船景，並讓李氏的大祠堂（已拆）中門大開，在中堂設宴招呼眾人吃飯，好不氣派。<sup>141</sup> 同時，為了避免兩岸扒龍舟引起衝突，李民雨組織磚瓦運輸船主將幾十艘帆船用鐵鍊串聯起來，形成一排船把北面的北海景和南面的渡頭景分隔開來，形成「一河三岸」之說。「三岸」是指從市橋至渡頭的水道兩岸加上帆船連成的人工臨時堤岸。<sup>142</sup> 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民眾無心於此，龍船民俗遂逐漸衰落。<sup>143</sup> 1944年淪陷期間，沙墟村仍舊於農曆五月初四舉辦龍船景。<sup>144</sup>

## 五、1949年以來磚瓦業和水運的式微和市橋水道龍舟文化的復興與再造

### （一）磚瓦業的轉型消亡和龍舟民俗的中斷與復興

1949年以來，南山峽地區的磚瓦業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磚瓦業開始合營，成立「禺南聯合窯廠」。1955年，該廠作為試點廠轉為公私合

<sup>139</sup> 李偉東，《話說沙灣鎮渡頭龍船——採訪當地龍船活動復興親歷者李森》。

<sup>140</sup> 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155。

<sup>141</sup> 李偉東，《話說沙灣鎮渡頭龍船——採訪當地龍船活動復興親歷者李森》。

<sup>142</sup> 陳藻，〈話說沙灣螺陽鄉〉，頁96-97。

<sup>143</sup> 沙頭街文化體育服務中心，《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申報書——南山古廟龍舟習俗》（2015），頁9。筆者也曾參與該申報書的修改。

<sup>144</sup> 王錦添，〈記番禺民間藝術——龍舟和飄色〉，《番禺文化》，2014年，第1期，頁30-34。

營，更名「禺南磚瓦廠」。在此期間，政府將以往土窯逐步改建，並轉為機器生產，建成輪窯。至1958年，北海埠被改建為水泥廠，嶼巖埠改建為陶瓷廠，南莊埠改建為染整廠（後遷市橋），生產磚瓦的窯廠更名為建材廠。以上這些廠均已成為縣級的地方國營單位。<sup>⑭</sup>

在南山峽地區磚瓦業轉型甚至逐漸走向消亡的情況下，當地的龍船習俗並沒有徹底消亡的跡象。「文革」期間蓮湖仍有新龍船進水並拜訪新橋及新橋幫助北海扒龍船的故事：

有一次，蓮湖村新龍船進水，按慣例，新龍船進水須到龍船各村作禮節拜訪。由於當時極左思潮影響，扒龍船的經費不准開支。他們扒到新橋時，天已黑了，船員們個個都精疲力盡，又餓又累。新橋村的幹部群眾知道後，馬上安排準備飯菜，熱情接待他們，飯後還臨時組織單車隊，專程送他們回家。在北海村，因當地許多村民都農轉非，當了工人，村裡農業人口為數不多，扒龍船時往往不夠人手，新橋村也曾多次派人前往參加，使他們都能扒上龍船，有段時間甚至把龍船也埋藏在新橋村。<sup>⑮</sup>

直到「文革」後期（1974年五月），番禺的龍船才被真正列為「破四舊」對象，上級派出宣傳隊（工作組）進駐各村督辦毀龍船。在原屬菱塘司的石樓等地宣傳隊發動村民起龍船銷毀，但遭到抵制，石樓大烏龍龍頭龍尾被村民巧妙地保存了下來。最後，宣傳隊只有自己動手把龍船挖出來。<sup>⑯</sup> 1976年五、六月，全番禺搜查收購龍船七十多艘集中市橋進行肢解拆毀，俱沉龍船於市橋仲元橋水下。

1979年，乘改革開放之風，沙頭村旅港同胞王啟仍為恢復家鄉龍舟活動，在香港想盡辦法購買優質紅木，並在外貿部門的協助下，將木材運回沙頭。在沙頭鄉親配合下，王啟仍於1980年初聘請了黃敬老師傅帶領徒弟黃傑銘、陳恆滔在沙頭「生祠圍」精工製造了兩隻龍舟。<sup>⑰</sup> 王啟仍還幫助沙墟從

<sup>⑭</sup> 後來，沙灣鎮在沙灣西村以西的南牌山與西角廟間新建磚廠，曾發展為全縣鎮、村同行業中經濟效益較高的工廠。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頁200。

<sup>⑮</sup> 石碁文化站，〈龍船會及新橋扒龍船〉，頁99-103。

<sup>⑯</sup> 陳秋明，《細說石樓「大烏龍」龍船》（未刊稿）。

<sup>⑰</sup> 王錦添，〈記番禺民間藝術——龍舟和飄色〉，頁30-34。



香港購得木材建造龍船。80年代沙墟經濟復蘇並逐漸恢復了龍船會，同時借助龍船會進行商業聯誼活動。當時，沙墟提供十幾畝地用來挖市石運河，後來又幫政府填埋，以所得回的地塊換取了經貿局的坤甸木造龍船。<sup>⑭</sup> 1981年六月六日，沙墟在市橋河上恢復端午龍舟競渡。1993年，北岸龍船會開始有組織地進行龍舟活動。每年北岸龍船會大部份村落都在端午前一個月輪莊召集成員村召開龍船會議商討當年龍舟活動，且大部份龍船會的成員村在每年端午前夕（農曆四月的最後一天）把本村的所有龍舟扒往沙頭南山古廟進行「請龍」、「採青」儀式。2011年以來，北岸龍船會由沙頭街蓮湖村（兩條）、沙頭村（三條）、北海村（兩條），市橋街的沙墟一村（四條）、沙墟二村（四條），大龍街的新橋村（四條）、石崗西村（兩條）、石崗東村（四條）、傍江西村（三條）、傍江東村（四條），共計32條龍舟組成。

而南岸沙灣龍船會所在的沙灣鎮龍岐、福涌兩個行政村，有的村坊是清中後期就有扒龍船的傳統，而有些村是改革開放後才出現龍船的。首先是1980年代在渡頭葉氏儉德堂帶動下，向市橋河北岸的傍江購買並修復了一艘撞壞的龍船，從而逐漸「喚醒」了當地的龍船記憶。第二年，渡頭保南堂龍船及周邊各村原有龍船的村都重裝新船，繼而帶動了本來沒有扒龍船傳統的一些村（如岐頭、洋五洲）和新龍船組織扒龍船。早於建國前，岐頭已有意裝龍船，由於村民反對只好作罷。而洋五洲歷史上非螺陽社成員，今屬於龍岐村管轄。龍岐村和福涌村重新組織龍船會，洋五洲才順應潮流新裝龍船「入會」。1984年，西郊（市海福祥堂）和南郊（市海福南堂）加入沙灣龍船會。其次是出現「新聯」、「聯青」兩個新的龍船組織。新聯龍船是1983年，在渡頭重新組織龍船會後，由70名「股東」合資購買了一條龍船發展而來；聯青龍船則是由年輕人和龍船愛好者自發組織籌款購買新龍船，是統活動與現代體育相結合的「運動俱樂部式」龍船隊伍。再者是得到譚妹（人稱「妹叔」）等企業家向包括保南堂、南陽、新聯、聯青等渡頭村龍船隊的大力贊助。<sup>⑮</sup>

「以『破龍船』之前算起，當時只有渡頭1艘、蘭陵1艘、『七星仔』即福田高礮坊1艘、田心1艘、市橋（西郊）1艘，即總共才5艘」。<sup>⑯</sup> 2000年前後，「沙灣龍船會」除了包括沙灣鎮福涌村（九條，新村沒有龍船）、龍岐

<sup>⑭</sup> 訪談筆記：陳廣發，2016年7月1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sup>⑮</sup> 李偉東，《話說沙灣鎮渡頭龍船——採訪當地龍船活動復興親歷者李森》。

<sup>⑯</sup> 李偉東，《話說沙灣鎮渡頭龍船——採訪當地龍船活動復興親歷者李森》。

村（16條）兩個行政村之外，市橋的西郊村（兩條）和橋南的南郊村（五條）<sup>⑫</sup>亦後來加入，加起來共有32條龍船組成<sup>⑬</sup>，數倍於舊時。<sup>⑭</sup>從其構成可見，沙灣龍船會除了涌邊村之外，南岸龍船會以清道光以來的螺陽社所屬村落為主體，既包括直接參與磚瓦業的村落，也包括間接參與的村落，除了西郊村外，其餘均位於南岸，故名「南岸（或沙灣）龍船會」。

建國後乃至改革開放恢復龍船活動以來，市橋河兩岸兩個龍船會的龍船，已改為五月初一開始扒龍船活動。龍船景的日子提早了，但龍船景的日程安排、各村先後次序，依然沿襲舊時習慣。北岸的探親「趁景」順序為：初一石崗景，初二傍江景，初三新橋景，初四沙墟景、西涌景，初五市橋景<sup>⑮</sup>；初六沙頭景，初七蓮湖景，初八渡頭、北海景；<sup>⑯</sup>沙灣龍船會的龍船探親「趁景」順序為：初一「請龍」、「採青」，初二龍岐村的岐頭、岐山、沙園、洋五洲，初三福涌村的田心、蘭陵、高礮坊等村，初四西郊，初五南郊，初六休龍一天，初七渡頭龍船景（與對岸的北海景重疊）。如遇上市橋河舉辦「蓮花杯」、「禺山杯」龍舟賽（一般是五月初五）的年份，由於比賽地點大多安排在南郊村對出的河段，故賽船這天就當作是南郊龍船景，不再另行安排，然後再安排五月初八扒渡頭龍船景。<sup>⑰</sup>（參見附圖4）

## （二）兩岸龍船會關於2011年南山古廟的遷移擴建的爭論

南山古廟的遷移和仿古大廟的建成，標誌着市橋水道沿線的龍舟民俗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北岸龍船會受訪者認為，2011年，廣州「亞運」前後，因修築堤壩和沿江公路的需要，番禺區水務局撥款向河岸北面遷移了南山古廟，並召開沙頭、市橋、大龍三街十村龍船會的幹部代表現場聽證會，當時參加會議的有：禺區政府領導，沙頭街道辦屬下的城管科主要領導，北

<sup>⑫</sup> 南郊為市橋水道以南沙田區居民構成；西郊原名烏稻沙，由大利和合益兩個圍組成。其人員由光緒二十九年（1903）10戶大山遷來的農戶和1952年市橋東郊及靈山、欖核、魚窩頭等南部沙田區的水上人家構成。參見番禺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番禺縣鎮村志》，頁41-42。

<sup>⑬</sup> 沙頭街文化體育服務中心，《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申報書——南山古廟龍舟習俗》，頁10-11。

<sup>⑭</sup> 而陳涌（屬沙田區）2016年才開始扒龍船，但未加入沙灣的龍船會。

<sup>⑮</sup> 即長龍「蓮花杯」龍舟賽和國際標準龍「禺山杯」龍舟賽。

<sup>⑯</sup> 據說，龍船會有一段時間扒十五水，後因農事關係才改為扒初一水。「北海景」賽龍在五月初七日。參見番禺縣文化志編纂委員會，《番禺縣文化志》（1996），頁96-97。

<sup>⑰</sup> 李偉東，《話說沙灣鎮渡頭龍船——採訪當地龍船活動復興親歷者李森》。

岸十村龍船會的蓮湖村「蓮溪金靈堂」，北海村「北津長賴堂」，沙頭村「碧沙仰賴堂」（以上屬沙頭街），沙墟一村、沙墟二村的「沙溪炳靈堂」（今屬市橋街），石崗西村「球山西社」，石崗東村「球山清河堂」，傍江西村（羅氏）「龍慶堂」，傍江東村（古氏「傍溪中約」、陳氏「傍溪東寧社」），新橋村新溪聖母宮（以上三村今屬大龍街）。會議決定由沙墟二村負責該項建造工程，除了向北遷移南山古廟之外，還在古廟外面新套建了一座更大的仿古大廟。<sup>⑬</sup>

至於南岸龍船會，據陳廣發口述：

2011年南山古廟平移擴建後，他們（指南岸龍船會）依據刊登在《番禺日報》一篇關於南山古廟歷史的文章主動向北岸龍船會提出「請龍」要求得到北岸龍船會的同意，但是南岸龍船會會提前去或與北岸龍船會錯開，並只會將其旗綁在兩旁的柱子上，會主動預留中間的柱子給北岸的龍船會。<sup>⑭</sup>

而渡頭人森哥的錄音顯示，南岸龍船會是一直都有去南山古廟「請龍」，跟亞運前後擴建南山古廟無關，但由於北岸和南岸的關係不好，所以北岸才說南岸是擴建後才模仿他們「請龍」。森哥說，亞運前後南山古廟要擴建，開始時也邀請過南岸的人到市橋開會討論，但後來區政府確定出錢支持後，北岸龍船會就未再找南岸的人來參與這件事，就連擴建立碑都只寫北岸龍船會的幾條村，完全把南岸排除在外，製造了「南岸跟南山古廟完全無關」的既定輿論事實。森哥還說現在去南山古廟「請龍」完全不用經北岸，因為那不是北岸的廟，誰想去「請龍」都可以，而且插了旗在那裡，北岸的人也不會因為看你不順眼而拔走你的旗，所以番禺健協的龍船隊到那裡「請龍」也可以，不會說不歡迎他們。（以上是森哥的說法）其他南岸的龍船人亦支持「南岸一直有到南山古廟『請龍』」的說法。<sup>⑮</sup> 值得思考的是，森哥說「他們一直都唔承認我們這邊的」。如果南岸的龍船會歷史上一直都有到南山古廟「請龍」是歷史事實的話，那麼說明南山古廟是一個對包括途經的所有船隻和南岸龍船會開放的廟宇，但是北岸一直不承認南岸，恰恰說明廟宇本身

<sup>⑬</sup> 訪談筆記：陳廣發，2016年7月1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sup>⑭</sup> 訪談筆記：陳廣發，2016年7月1日，廣州市番禺區文化館。

<sup>⑮</sup> 據渡頭人森哥的採訪錄音整理，該錄音由李偉東先生提供。

地處北岸，其控制權一直掌握在北岸各村的手中，事實上，南山古廟重修後，廟裡的維護、清潔、香火及人員等開支，均由北岸十鄉龍船會負責。

## 六、結語：水運社會的地方文化網絡的「結構過程」

宋元時期，南山峽和沙墟、沙灣之間仍是番禺大穀圍西南邊緣的一處淺海灣，其西北的平石鎮和東邊的沙墟就已經是盛產磚瓦和陶瓷的市鎮。到元代，地勢險要的南山峽一帶就成為佛寺的棲息之地。元明之間，由於南山峽地區盜寇出沒，船難頻發，佛寺屢毀屢建，最後歸於湮沒。

明中後期，隨着白沙堡以南市橋平原的形成，平石、沙墟兩地水運的衰落，地處兩者之間的南山峽和市橋分別發展成為磚瓦業和造船業中心。至遲到明代中後期，南山峽口開始出現磚瓦業，並向南北兩岸村落擴散。官府為了加強對市橋河道的管治，將原來位於白沙堡的沙灣巡檢司南遷到臨近江邊的市橋。地勢險要、盜亂猖獗和船難頻發催生了林大相公崇拜。

明清之際，社會動蕩不安，盜亂不斷，沙灣大族遭到奴僕和螺陽七鄉的進攻，由此奠定了難以調和的關係。清初遷海復界後的雍正年間，隨着非遷海區民眾的集聚，市橋水道上游的磚瓦業和水運再度繁榮，催生了天后崇拜。

清乾隆年間，隨着廣州一口通商貿易的發展，南山峽地區在水運方面的地位日益重要，官府除了在鄰近的地區設立市橋掛號口和紫泥掛號口納入粵海關港口管理體系之內，為了加強防衛，官府還直接介入到南山峽地區的管理，在此設立沙灣埠和營汛派駐官兵駐防，管理地方治安，徵收賦稅。同時，隨着磚瓦業的復興，形成北岸的南莊、南山、北海，南岸的渡頭、杉巖、蘭陵等磚瓦埠。而渡頭則成為南山峽地區最重要的磚瓦業生產基地、市場及水運中心。乾嘉年間的磚瓦業和水運的繁榮，為渡頭、玉棠、汀根等村的侯王、華光火神崇拜的出現創造了契機，在造船業和水運中心的市橋，形成以鳳船水色巡遊祭祀天后的民俗，「林大相公」逐漸成為南山峽一河兩岸及周邊臨水村落的共同水上保護神。

清道光年間，為應對盜寇、大族欺壓等社會動亂，南山峽兩岸及下游地區村落紛紛建立社學團練，作為鄉村防禦聯盟機構。南岸的螺陽社各村，在與沙灣大族及北岸村落的對峙中形成聯盟，岐山張殿銓家族等地方精英在建立社學、抵禦咸豐年間洪兵之亂中發揮了領袖作用。在市橋水道北岸，由於盜亂頻發和大族欺壓小族以及洪兵之亂，分屬不同社的村落在競爭中分化重

組，形成新的村落聯盟。

清同治、光緒年間，南山峽地區磚瓦業發展達到鼎盛並成為珠三角重要的磚瓦建材中心，形成熟瓦行和生瓦行等行業組織，以及區域性的行業神（大禹、關帝等）祭祀組織。南山古廟成為兩岸的龍船「請龍」、「採青」之地。

該地區的磚瓦業生產和水運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20世紀30年代，主政番禺縣的李民雨、張正時等地方精英在未破壞地方文化網絡的情況下，對延續水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到了20世紀40年代，控制市橋及大穀圍地區的「市橋皇帝」李輔群（即李塋雞）與北岸的大族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從而促使北岸龍船會村落聯盟的進一步整合。

市橋水道南北兩岸與珠三角腹地及西江中上游的水運網絡是這個水運社會文化網絡中最大的一個圈；南北兩岸分屬沙灣司的同風、親仁、平康、親仁、同安、螺陽等不同社的村落是水運社會文化網絡中較小的一個圈；兩岸從事磚瓦業的村落和南北兩大龍船會的成員是這個地方文化網絡中另外兩個圈。村社聯盟，磚瓦業業緣，民間信仰圈，龍船會，宗族關係，甚至地方精英的交往等水運社會中，多個屬於不同體系的社會網絡，不同時期，在相互疊加、交互作用中織造了光怪陸離的地方文化網絡。

北岸地區村落屬於不同的村社組織，磚瓦業村落集中於南山峽（即市橋水道上游）北岸，他們包括北岸部份磚瓦業村落在內、以平康社的村落（沙墟為核心）為主體，通過各種契機（與南岸村落的競爭，特別是與盤踞市橋的李輔群的對峙）結成聯盟。而南岸的村社地緣關係、磚瓦業業緣關係與龍船會高度重合，他們以渡頭為水運樞紐、市場和祭祀中心，在與北岸村落和沙灣大族等的競爭發展過程中結成聯盟。清中葉以來，隨着龍船民俗的普及，南北兩大村落聯盟的臨江村落，以市橋水道為界，組成兩大龍船會。<sup>⑥</sup>由於他們都屬於同一水運網絡，「林大相公」被塑造成龍船的保護神，兩岸大部份成員每年端午節前夕都會到南山古廟進行「採青」、「請龍」，通過該儀式表達村落之間的水上關係網。

1949年以來，隨着南山峽兩岸地區的產業轉型，磚瓦業已不再是兩岸發展經濟的支撐。改革開放以來，兩岸的龍舟習俗重新復興，政府、港澳同胞、民營企業家等成為重要的推動者。尤其是2011年南山古廟移位擴建後，

⑥ 南北兩岸龍船會形成的過程，其實還應該是沙灣巡檢司部份地方大族（如螺陽社與沙灣宗族，市橋宗族與沙墟、沙頭宗族等）在爭奪東南部沙田過程中分化成兩股勢力的過程，這部份擬另文論述。

龍船會成為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接納了非民田區的成員進去，龍舟習俗及其所反映的地方歷史文化脈絡得以延續和重構，南山古廟的「採青」、「請龍」習俗的形成是歷史上該地區社會文化網絡的儀式性體現，是維持地方社會以磚瓦業為主體的水運社區關係和鄉村聯盟傳統認同的重要紐帶。2015年以來，「南山古廟龍舟習俗」（扒龍舟）先後被申報納入區、市、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作為「非遺」的「南山古廟龍舟習俗」也成為番禺區政府每兩年在市橋水道舉辦一次的「禺山杯」和「蓮花杯」龍舟賽的某種歷史依託，是華南地區水運網絡儀式化表達的當代復興與再造的典型個案。

從文化與權力維度研究中國鄉村的杜贊奇範式作為20世紀中國鄉村研究的重要範式之一<sup>①⑥</sup>被廣泛接受和運用。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導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和「國家的政權建設」兩個概念。他認為：「文化網絡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構成」，它包括宗族、市場等方面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如強制性的廟會和自願性的水會、商會等），還包括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如血緣）。<sup>①⑦</sup>他在書中還提出了「經紀」的概念，就是國家權力向農村擴張的產物，是代表國家在農村行使其權力（尤其是徵稅）的中介，分為「保護型經紀」和「營利型經紀」兩種不同類型。<sup>①⑧</sup>

然而，隨着學術界對該問題研究的深入，對杜贊奇範式進行批評和修正的研究也不斷出現，特別是對其概念的解釋力提出質疑。<sup>①⑨</sup>杜贊奇認為「保

①⑥ 其餘三個範式為：從市場維度研究的施堅雅範式、從宗族維度研究的弗里德曼範式以及從經濟維度研究的黃宗智範式。參見鄧大才，〈超越村莊的四種範式：方法論視角——以施堅雅、弗里德曼、黃宗智、杜贊奇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頁130-136。

①⑦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10。

①⑧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頁24-25。

①⑨ 相關研究參見：嘉日姆幾，〈雲南小涼山彝區村落空間生成研究——與杜贊奇「權力的文化網絡」之理論對話〉，《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頁40-50；曹海林，〈下沉與應對：村落政治運作的真實圖像？——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述評〉，《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頁7-11；魏治勳，〈論鄉村社會權力結構合法性分析範式——對杜贊奇「權力文化網絡」的批判性重構〉，《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頁99-104；劉擁華，〈向何處尋求權力運作的正當性——兼評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社會科學》，2009年，第12期，頁62-71、183；王興飛、楊振東，〈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再探——對鄉村組織、文化網絡與傳統權力運作的思考〉，《宜賓學院學報》，2011年，第8期，頁62-65。

護型經紀」。「在文化網絡中出任鄉村領袖的主要動機是出於提高社會地位、威望、榮耀並向大眾負責的考慮」。然而本文提到的張殿銓及其家族作為清代南岸螺陽社傳統的「保護型經紀」，卻並非沒有任何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倡設螺陽社學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為了團結七鄉抵禦大族欺壓和盜匪，保護當地磚瓦業安全；另一方面，他在當地投資物業，也是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民國時期的「經紀」不一定是「營利型經紀」，像李民雨、張正時這樣的民國精英在地方原有文化網絡未被破壞的情況下，繼續起到「保護型經紀」的作用；又如李輔群這樣的「大天二」，典型的「營利型經紀」其實也是具有兩面性的。北岸鄉村聯盟與李塋雞集團通過之間勢均力敵的對峙，說明民國「營利型經紀」的出現並不能真正破壞原有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中產生的領袖人物——保護型經紀。

蕭鳳霞(Helen Siu)和劉志偉提出「結構過程」(structuring)的分析模式，認為個人透過他們有目的的行動，織造了關係和意義(結構)的網絡，這網絡又進一步幫助或限制他們做出某些行動，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這些重要的關係網絡涉及地理空間、村落形態、生業、市場、土地經營、社會組織與等級、族群分類、信仰儀式諸方面，後者則構成珠江三角洲的社會結構。<sup>⑩</sup>由於宋元以來沙灣司市橋水道上游地區水運社會的「權力的文化網絡」是由多個屬於不同體系的文化網絡，在不同時期相互疊加、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以「結構過程」的分析框架來對其進行歷時性的動態演繹，或能更加立體還原其「織造」與「再織造」的路徑和圖景。

(責任編輯：唐金英)

<sup>⑩</sup>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54-64。

附圖1：宋代南山峽及市橋、沙灣水道周邊地區海岸線及平石鎮、沙墟、市橋等位置圖



附圖2：明清以來南山峽地區磚瓦業村落及當代市橋水道南北兩岸龍船會成員分佈圖





附圖3：南山峽地區有侯王、華光崇拜的磚瓦業村落分佈圖



附圖4：改革開放以來市橋水道南北兩岸龍船會「請龍」、「採青」及「趁景」路線圖



附表1：原螺陽社村落主神崇拜簡表

村名	主要廟宇與祭祀的神明	是否從事 磚瓦業	是否扒龍 船，龍船村 主廟堂號	
龍 岐	渡頭（龍津）	侯王宮（大廟），侯王（村主）；蟠龍廟，不詳；北帝廟，北帝；觀音廟，觀音；師傅廟，大禹；洪聖廟，洪聖；關帝廟，關帝	是	是，保南堂
	岐頭	侯王廟（細廟），侯王（村主）；星拱廟，北帝；玄壇廟；娘娘廟，天后	是	改革開放後才有龍船，輔應堂
	岐山上坊（大巷）	三帥廟，主帥（村主）；華光廟，華光；文武廟，文武二帝	是	是，道果堂
	岐山下坊（沙園）	天后宮，天后（村主）；四聖宮，未詳		是，未詳
福 涌	新村	侯王廟，侯王（村主）；水月宮，觀音	是	否，福澤堂
	石涌	波羅廟，洪聖（村主）	是	是，未詳
	福田（田心）	福田古廟，北帝；聖母殿，天后	是	是，未詳
	蘭陵	關帝廟，關帝	是	是，未詳

資料來源：中共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人民政府編，《沙灣鎮志》；曾家豪、曾秉，《龍岐村簡志》，頁7-9。

說明：其中《沙灣鎮志》中福田村部份的廟宇：波羅廟同洪聖廟，聖武（應為「母」）廟（應為「殿」）和娘娘廟、天后廟，福田廟和另外兩間北帝廟有可能重複。

附表2：南山峽北岸磚瓦業村落民間信仰與龍船會對照簡表

村名	所屬社	主神或所屬祭祀組織	是否從事磚瓦業	是否北岸龍船會成員
汀根	同風社	華帝殿，有出會。 聖王宮（大廟）、玄壇廟、武帝古廟、阿婆廟	是，民國中期已有磚瓦業	否
雙坑		天后宮，附祀華光	是	否
玉棠		華帝殿、五帥府（包括華光在內）	是	否
南山		北帝廟、天后宮、南山古廟	是，南山、雙坑、玉棠三村解放前共有土窯（磚瓦廠）十多間	否
蓮湖	先後歸親仁社和同風社	華光廟，正月十六日為華光誕，1949年前有出會	是	是
橫江		車公廟、觀音廟	是，解放前有簡易磚廠一間	否
沙頭	先後歸親仁社和平康社	南昌古廟、七鄉會	否	是
大富		情況不詳	是，解放前有磚（瓦）廠八間	否
北海		情況不詳	是，北海南莊康熙年間便是紅磚產區	是
土涌		情況不詳	是	否

### 附錄1：2011年《南山古廟重修碑記》碑文<sup>①</sup>

時惟升平盛世之年，繁榮昌盛之日，這應感謝前人的功勳。古語云：前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前人，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這是千真萬確的。為此，我們應追念到上世紀的一九七八年，黨中央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他部署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大膽創新改革開放，這全歸鄧小平同志，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至於南山古廟的歷史背景，眾說紛紜，現只擇其多數的說法，特書其簡單歷史於後：相傳在大清時代，有一文人秀士，上京赴考，在歸途中，行至南山峽附近，遭海盜行劫，更遇狂風暴雨，致被溺水而死。這簡單歷史，只是傳說而矣，也沒有歷史記載，很難考究，後人在此建一座石廟，命名南山古廟，建於乾隆年間，至光緒年間重修，只可惜是廟內一尊石像，現今丟失了，可能在文革時期十年浩劫中毀失的。廟內有一副對聯：上聯是「人間施惠澤」，下聯是「海若顯靈通」，這可見當時對人們有不少的護蔭，後稱該秀士叫林大相公。為了發掘番禺的歷史文物，弘揚番禺的文化古跡，創建和諧幸福番禺，所以區政府領導對此十分關注，決定撥款重建南山古廟，並隨即召開三街十村龍船會的幹部代表參加現場聽證會，當時參加會議的有：番禺區政府屬下的水務局領導，沙頭街道辦屬下的城管科主要領導，蓮湖村蓮溪金靈堂，北海村北津長賴堂，沙頭村碧沙仰賴堂，沙墟一村、沙墟二村沙溪炳靈堂，石崗西村球山西社，石崗東村球山清河，傍江西村傍西龍慶堂，傍江東村傍溪中約、傍溪東寧社，新橋村新溪聖母宮。會議中區政府強調要推選出一村負責該項建造工程，區政府提出後，眾村異口同聲，一致認為沙墟二村為最佳人選，在不負眾望的環境下，沙墟二村接納了這項重托。該項工程於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動工興建，精密度很高，所以每天要派二人視察。這是對工程的負責，對歷史文物的高度重視，是應盡的天職。沙墟二村為重建南山古廟搞得盡善盡美而努力，為子孫後代而多做貢獻，謹立片石，以垂留念。闔鄉同人勒石，重修時間：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農曆八月初一

<sup>①</sup> 碑文豎排改為橫排，其中的句法、字詞錯誤，簡繁體字照實錄入，不作修改。參見李博、區非遺中心，《南山古廟請龍、採青活動普查隨記》（未刊稿，2014）。

## 附錄2：南山古廟龍舟習俗的主要儀式<sup>108</sup>

南山古廟「請龍」、「採青」儀式之前，有「起龍」、「龍標」、「洗龍」、「請龍」頭幾個步驟，在其後，有各村「探親」（「趁景」）、洗龍舟水、龍船飯、藏龍等幾個步驟。下面分步驟來介紹：

### 一、前奏

起龍：龍舟在平時都會被埋藏於河涌淤泥下或沉於水底，每逢端午前，各村都會請風水先生擇吉日，由村中的龍舟手，在爆竹聲中將龍舟從水（泥）下請出，起龍儀式是各個村分別進行的。

龍標：是指龍船活動的贊助資金。早期龍舟活動的開展大部份是由各個村民出力、出物辦成，因此沒有龍標一說。龍標是近幾年才形成的（約有七至八年歷史）。近年來，龍舟活動的經費主要以村集體經濟出資和各種贊助資金組成，其中的贊助資金就是「龍標」。以沙墟二村為例，每年洗龍前由村委組織在舊經貿局處進行投標，與村定價相符者中標。

洗龍：將請出的龍船用清水洗淨並放在陰涼處風乾，並對龍舟該修補的地方進行修補，最後上桐油備用。

請龍頭（該步驟蓮湖、北海兩村已沒有）：每年農曆四月的最後一天（農曆四月二十九或者農曆四月三十，視具體年份而定）上午八點，村民拿齊本村所有的龍船頭和龍船尾，放置於一輛事先準備好的掛紅三輪車上，一起前往本村的祠堂或村主菩薩處進行拜祭儀式，隨後貼上淨水符才將龍舟放下水中，此為請龍頭。

### 二、南山古廟「請龍」和「採青」儀式

完成「請龍頭」儀式，並吃完午飯後，村中所有船員上龍舟就坐，請一位五福俱全的老者手提一桶水，拿着黃皮葉將桶裡的水由船頭撒到船尾，隨後龍舟離岸駛向南山古廟。到達南山古廟的岸邊後，先由船上剛新婚的船員（人數不限）拿着任意一面旗（包括：頭牌刺繡、羅傘、百竹旗）、銅鑼跟尾護送，爬上南山古廟附近的崗頂將旗插好，再在附近採摘龍船花等戴於帽子上方能下山。（插旗主要寓意早生貴子，發展到現在也是一種龍舟採青報道的形式。）下山後，所有龍舟成員方可登陸，到南山古廟中擺燒豬、燒紙

<sup>108</sup> 沙頭街文化體育服務中心，《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申報書——南山古廟龍舟習俗》，頁10-14。

錢、敬香拜神「請龍」。最後在廟外燒上炮仗，上船一路敲鑼打鼓劃回村中，此為「採青」。兩個龍船會到南山古廟進行「請龍」和「採青」儀式的時間略有不同，北岸龍船會為每年農曆四月的最後一天（農曆四月二十九或者農曆四月三十，視具體年份而定），南岸龍船會則為每年農曆五月初一。

### 三、「探親」和「趁景」

在南山古廟「請龍」、「採青」儀式之前的活動一般只有龍船會、龍船手參與其中，之後的活動則是無論各村男女老少都參加。

「探親」（「趁景」）：是指龍船會兄弟村落之間在端午期間的相互拜訪活動。一般探親的順序是由龍船會事先安排好的，探訪人出發前備好拜訪帖，到達被探訪村落後，上岸前將拜訪帖交於前來接應之人，並將此貼在村中公示。之後，便是各龍舟在河道上爭相競演的時間，此景能吸引成千上萬的群眾前來觀看。北岸龍船會探親的順序為：初一拜訪石崗，初二拜訪傍江，初三拜訪新橋，初四拜訪沙墟，初五拜訪沙頭，初六拜訪蓮湖，初七拜訪北海。南岸龍船會的探親順序為：初二訪龍岐，初三訪福湧，初四訪西郊，初五訪南郊，初七還會組織所有成員在一起到渡頭、北海村河段，參加北海游龍景。每年的北海景（又稱為渡頭景）所在的河段，是兩大龍船會所有村落的龍船唯一集中展示的地方，盛況空前，光是觀看龍船景的群眾每年不下萬人。

### 四、後續活動

散龍礮：指在探親後，村委將視為「龍礮」的新鮮三華李（梨子）派發給船員和觀景的村民。其中大龍街新橋村的散龍礮習俗最為出名，每年農曆五月初五進行散龍礮儀式。當天村民們早早到聖母宮外廣場等候，爭相用傘接過從高處滾落下來的「龍礮」，祈求世代平安。

洗龍舟水：過去河涌水質乾淨，在游龍後，村民用龍舟劃過的河道裡的水洗臉或洗澡稱之為洗龍舟水，寓意着身體健康。

龍船飯：指村民們集中到一起到村中祠堂或河邊一起吃飯，以前龍船飯大多在晚上進行，近幾年開始流行中午吃龍船飯。龍船飯場面盛大，除了全體村民都會參加外，許多前來探訪的親朋好友和友好單位也會參加。80年代龍船飯場面最為盛大，有萬人之多。

藏龍：在整個龍船活動結束後的第二天，村民將龍船重新埋於河底淤泥之下，稱之為藏龍。至此才算完成整個龍船活動。

禁忌：1、有白事在身未滿百日的不能上船。2、家中剛有嬰兒出生未滿月的不能上船。3、所有女性不能上船。

### 附錄3：2014年5月28日北岸龍船會部份村落到南山古廟「採青」、「請龍」儀式實錄<sup>109</sup>

2014年5月28日，番禺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普查隊（人名略）四人到南山古廟進行非遺普查，下午北岸的沙墟一村、二村（炳靈堂），沙頭村（仰賴堂），蓮湖村（金靈堂）四村龍船隊將到南山古廟進行「請龍」和「採青」活動。當日普查及活動概況記錄如下：

「請龍」、「採青」是端午節龍舟活動的重要部份，在起龍、請龍船頭、組裝完成之後，通過「請龍」、「採青」獲得神明的庇佑，以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當日，我們到南山古廟的路上，就已經看到運輸當日所需物資的汽車，到達時，廣場前方圍欄上已經插了許多祠堂堂號、龍船會的旗幡。自西向東計有八面，紅邊白底幡一條、三角形旗七面，分別為北岸的「北津長賴堂」、「西社神農堂」、「新溪」、「傍溪龍慶堂」，南岸的「龍津保南堂」、「龍津聯青」、「福涌好友」，證明這些龍舟隊已經到過這裡進行「請龍」儀式。下午，這裡還會多出幾個寫有祠堂堂號的旗子。

這天下午有北岸的沙墟一村、二村（炳靈堂），沙頭村（仰賴堂），蓮湖村（金靈堂）四村龍舟隊到南山古廟「請龍」、「採青」，炳靈堂有八條龍船參加，其中沙墟一村兩條，沙墟二村六條，仰賴堂四條，金靈堂兩條。

到下午一點三十五分時，沙溪（沙墟）炳靈堂的龍船開始陸續到達。這些龍船長二十多米，寬約一米多，一般船中間有一鼓，前後各一鑼（有的無鑼），用來發令、鼓氣，船前部後部各有一面鑲邊的三角形旗子（有的只有一面），上書該船所屬的堂號，比如「沙溪炳靈堂」等，船頭船尾為雕刻精緻的龍頭龍尾，並飾以用彩布做成的花簇和令旗。每條龍船的頭尾有人站立，前後幾人單排，中間都是並列兩人。整條龍船大約共有七八十人，均為青壯年，看起來年齡都在二十到四十多歲之間，統一身着印有堂號的籃球服（有的船隊是統一的T恤）、草帽。

龍船在鼓聲和吶喊中行到古廟前停止，龍船手（扒仔）們下船後上岸到廟前持香火草紙供奉參拜，並點燃鞭炮，把寫有自己堂號的旗子繫到廟前的

<sup>109</sup> 李博、區非遺中心，《南山古廟請龍、採青活動普查隨記》。

欄杆上，或者喝水、吃些食物補充下體力，稍作休息再參拜。拜完古廟之後就是「採青」了。所謂「採青」，就是到附近採摘綠色的枝葉。龍船手們到廟後植物茂密的小山上面，摘取樹枝樹葉和花，插到龍船的船頭船尾上、旗杆上、草帽上等很多地方，以討吉利，得到庇佑。

完成這些事項，龍船手們開始陸續回到船上。大約下午兩點，沙墟兩村的龍船開始陸續調頭返回。這時碧沙（沙頭）仰賴堂的三條龍船開始在鼓聲和吶喊中到來，龍船的大小形制與炳靈堂的船差不多，中有一幡，前後各一面鑲邊三角旗，均書船隊所屬堂號。其後還有蓮溪金靈堂的兩條龍船到來，靠岸後也以同樣的流程完成「請龍」和「採青」儀式。各龍船隊從到來儀式完成的過程大約用時半個小時。

在活動過程中，每條村都派出一條汽艇跟隨，汽艇上有各村村委會的字樣。這些汽艇一般是用來載龍船手所需物資的，比如礦泉水、龍鬚（即三華李）等，應該也要負責處理一些突發情況。



The Local Cultural Network of the Society  
of Water Transport:  
the Dragon Boat Culture and Brick and Tile Industry  
from the Song dynasty in Shawan Inspection Department,  
Panyu County of Guangzhou

Guangwen Z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  
Cultural Center District of Panyu Guangzhou

**Abstract**

Nanshan gorge locates in the upper stream of Shiqiao waterway and belongs to Shawan Inspection Department, southwest of Panyu county, Guangzhou. It connects the estuary of the Pearl River with the hinterland, up to the mid- and upper stream of the West River.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society of water transport and its cultural network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e authorit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d set up the Inspection Department, barracks, and sub-customs to govern this area. Depending on the convenient water transport, the industry of brick and tile also flourished in this region and made this region one of the producing centers of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materia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worship of the god of fire, a god for this industry, appeared accordingly. This region was dangerous but of great strategic importance; many boats wrecked in this region, and brigands were endemic. The worship of the river god at the ancient Nanshan Temple took shape due to the above reasons.

From the mid-Qing dynasty, the two sides of the river became

---

Guangwen Z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 Cultural Center District of Panyu, Guangzhou, 511400,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772625091@qq.com.

different groups due to the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clans, the local turmoil, the regrouping of villages, and the brigand group Datian'er.

Villages producing the bricks and tiles formed two associations and dragon boat leagues. They went to the Nanshan Temple to hold the ceremony of Caiqing (to obtain good luck) and Qinglong (to invite the dragon boat) on the Eve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They held these ceremonies to maintain the network of the water ties among different villages. Thus,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s that belong to different systems Coexisted, whose interaction created a complicated local cultural network.

After 1949, the industry of brick and tile disappeared and transformed to other industries. Since the late 1970s, the traditions of dragon boat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have revived and been reformed. The dragon boat league has recruited new members in a more open context. The original local tradition was reconstructed and passed down to present.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tradition of the dragon boat at the Nanshan Temple became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dragon boat race, which was held at the Shiqiao waterway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area of Nanshan gorge is a typical case showing that the cultural network among societies of water transport in South China had experienced multiple reconstructive stages which made it reappear in the form of the dragon boat tradition.

**Keywords:** Shawan Inspection department of Panyu County, Nanshan gorge, the industry of brick and tile, Dragon boat, society of water transport, cultural network